

本期关注

- 04 如何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
- 08 幸福在哪里？ / 张哲
- 10 “藏富于民”应列为基本国策 / 徐迅雷

新闻聚焦

- 12 2013，栽山再出发 / 欧燕萍
- 16 留住历史足印 传承城市文脉 / 孙奕
——杭州市政协文史工作坚持特色开拓创新结硕果
- 20 让主体活力竞相迸发 / 周方
——市政协委员“岗位建功、履职为民”进行时
- 24 短讯三则

建言立论

- 26 瑕瑜互见 前景可期：免费高速那些事儿 / 刘建华
- 29 绕城高速免费通行：好处多 / 刘英团
- 31 高速免费大餐，下咽有点难 / 王国荣
- 33 五水共治，弹好协奏曲 / 童颖骏
- 34 凤凰之殇 / 陈宇峰
- 35 越重科技进步，越该求真务实 / 邓海建

深度思考

- 36 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几个问题 / 刘学军
- 40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总体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 40 直面中小城镇气象灾害
- 40 文化发展要抛弃管制思维
- 40 新媒体给法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走进委员

- 41 力与美的艺术使者 / 傅一览
——记市政协委员、香港国际美术学院院长徐熾婷
- 45 打造中国最优秀的服务外包公司 / 汤媛媛
——记市政协委员、浙江大运盈通信息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海燕

万象天地

- 49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气神” / 沈者寿
- 50 像是游戏：给全民发工资 / 石久

- 51 杭高老同学华贻芳 / 孙霆
54 孩子长大要像谁 / 黄亚洲
56 在改革的日子(上) / 周玉玲
59 《申报》笔下的胡雪岩 / 张学勤
63 西湖的历史星空(之五十七) / 孙跃

如何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

写在卷首：2014年马年春节临近，“马上有钱”、“马上有房”、“马上有车”……等“马上体”开始成为流行语，“马上体”流行背后透视着老百姓最朴实的愿望——如何提高收入，如何让钱袋子鼓起来。

本期主题：提高百姓收入

本期主持：司马一民 《杭州日报》首席评论员

本期嘉宾：万润龙 《中华工商时报》

新闻总监傅立群 杭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姜一飞 市政协委员、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王建平 萧山区政协委员、《萧山日报》财经周刊主编

本期策划：欧燕萍文字整理：孙奕

司马一民：收入分配问题与每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总体经济环境也遭遇冷风，企业老总的利润在变薄，产业工人的腰包也在变瘦；公务员群体在抱怨已经10年未涨工资……各行各业都在企盼荷包能鼓起来，面对这样的公众愿望，虽然我们在座的各位没有诸葛亮的计谋，但是坐在一起议一议，发出一些声音总是可以的。

堪忧——收入分配的诸问题

傅立群：居民收入问题是老生常谈，常谈的原因：首先这是民生的关键，其次这个问题多年来解决得不太好。

应该说，中国当前阶段收入差距扩大，是在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的差距拉大，但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并没有得到解决和缓解。第一，过高的基尼系数，总体反映了收入的两极分化；第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差距仍处在高位徘徊水平；第三，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比重没有缩小的趋势，基层劳动者报酬过低。

司马一民：问题是明显的，顶层的目光也是聚焦到这个问题上的。每年的全国两会报告中都会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但是似乎缺乏具体的手段和措施。

傅立群：这也是我想说的，我们的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调整收入分配的手段。

在我们国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初次分配中存在严重的不公平，一些部门、行业 and 个别社会成员垄断经营或竞争初始条件的不平等；改革不到位，既得利益集团凭借“行政权力”

“垄断势力”实施超额分配公共资源；特殊产业和地区的差别政策，使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先富了起来。二是再次分配功能的严重缺失，税收改革没有到位、功能作用缺位、政策措施苍白。三是收入分配货币化程度低、透明度不高，加之腐败问题，使一部分社会成员能够轻易获得“灰色收入”“非法收入”和“额外福利”“特别津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深入改革。

在短期内要缩小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政策来实现，完善税收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手段；而在长期则需要通过全面提高教育水平以实现机会均等来实现，形成社会向上流动的正常机制。

近年杭州市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均高于GDP的涨幅。“提低、扩中、限高”需要具体措施。用好财政资源，调节收入差距，是政府的主要责任。随着杭州财政全额事业机构的急速膨胀，很大一部分税收都被庞大的行政成本消耗了。杭州市出台了全面深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的决定，其中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对老百姓也是一项增收的“福音”。

姜一飞：提高居民收入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不像傅老师那样对收入分配问题有一定的研究，我就谈点

切身感受吧。

我觉得个人而言，真正的公平，其实就是每个社会心里都觉得舒服。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往往意味着就业能力不同，也意味着将来收入的不同。所以首先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平等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政府的责任就在于创造这样公平的环境。

求索——提高收入办法总是有的

万润龙：我接着谈一下，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也是个传统的话题。为谈好这个话题，我做了一些思考，借此机会谈一谈。

居民收入大致可以分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翻的目标，但是如果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跑不过CPI，那么翻一翻就等于没有翻。

在提高工资性收入方面我比较推崇瑞典模式——即员工工资与物价同涨。

当物价上涨后，员工就有权力与企业老板协商要求涨工资，一般企业老板会根据物价上涨幅度做出回复，但是遇到老板周转资金紧张，无法给员工上涨工资的时候，政府就会动用税收补给企业，给员工上涨工资。由于制度设计的完备，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福利形成制衡铁三角关系，政府税收资金充盈，企业经营理论和收入比较稳定，基本都呈直线上涨状态。

财产性收入的市场在我国是需要培育的。老百姓对这块市场也有期盼，政府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建设好这个市场的秩序，给财产性收入市场提供阳光、透明、法制化的外部环境，让老百姓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口袋里的余钱投向哪里，并取得良好的收益。

经营性收入依托的是产业政策和总体经济发展环境。套用句俗话就是要把蛋糕做大，才有条件切蛋糕、分蛋糕。

司马一民：对，我始终坚信一个理念：财富是创造出来的。

万润龙：杭州作为旅游型城市在产业布局上应该发展旅游产业的配套产业。早在2008年，杭州市曾确定发展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十大特色产业，以期许为杭州发挥自身优势，成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我认为杭州的这个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可惜在2010年以后杭州没有很好的执行下去。

王建平：提高居民收入是大家的美好愿望。刚刚各位老师主要提到了政府层面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我认为在个人层面，应该关注怎样通过学习、培训提高个人的能力和素质，推动社会的进步。

俗话说“行行出状元”，而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是有弊端的，大学的扩张使职业教育遭遇冷落。而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的却是有职业素养的技工。例如，一个厨艺高超、同时具备管理能力、成本控制意识和客户源的行政总厨年薪可达30万以上，而这样的人才却难以寻求。

万润龙：提到职业教育，我插一嘴。德国的高精尖制造业为什么如此发达，就是得益于职业教育体系的配套合理。德国的职高生占全比为全部生源的51%。

后盾——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让钱袋子不瘪下去

司马一民：不知不觉，大家从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表象延伸开去，提到了提高居民收入的后盾问题，那就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包括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诸问题。

姜一飞：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国人为什么不敢花钱、不敢消费，根源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社会的老龄化、人口红利的下降使许多青年人开始担忧养老的远虑问题，自然不敢潇洒地花钱；二来花钱要花得舒心，出门花钱如果怕堵车、怕雾霾，谁还愿意出门消费。

王建平：所以建议政府在公共财政的投入使用方面要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增加教育、养老、住房、医疗卫生经费支出，提高政策的普惠性。

司马一民：总而言之，政府要设置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有了政策兜底，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也许不会让居民的钱包鼓起来，但至少不至于让老百姓的钱包瘪下去。

幸福在哪里？

■ 张哲

钱袋子的话题，大多与“幸福”擦边，民富国强，是个永恒的话题。当下，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中，中国人幸福与否，与钱袋子关系密切。

我不太赞成“国强民富”这个词，中国古代，都是讲“民富国强”的，两个词虽然有些小差别，但其意义区别却不小。

但中国，还是依着“国强民富”的路子在走，国家先强大了，老百姓再让他们富裕起来，可是，深究起来，国家是靠什么强大的，这个很重要，因为这直接决定后面两个字能否实现。

如果国家的强大，靠不公平，靠投机倒把，靠钻法律空子，靠权贵阶层的垄断，那么我悲观地说，要实现后边两个字，难矣。

不过，任何抱怨都没有用，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虽然荆棘满地，总要依着披荆斩棘的精神去开拓，去努力吧，还不晚。

那么，一个问题摆在眼前，怎么让民众富起来？

更确切的应该说，怎么让民众的生活幸福起来？

所以，仅仅是钱袋子鼓起来，是没用的，因为钱袋子鼓起来的速度，如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还是在倒退，大家还是在幸福的边缘徘徊挣扎。

幸福的第一步，就是“足用”。这个足用两个字是基础，要让大部分民众实现，可不简单。要知道，现在“年轻”的中年人中，许多都是负债累累，一套房子一个孩子就让他们气喘吁吁，“足用”似乎还是普通打工者未来的愿景吧。

可喜的是，居民倍增计划，罕见地成为中国本届政府的施政目标，不过，这个目标，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吗？

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2008年之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53.3%下降到47.6%，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由67.5%下降到58.3%，而政府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则由14.5%上升到19%。

也就是说，过去这些年，政府和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此消彼长，居民的收入比重自然是降低了。

清华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白重恩的研究显示，中国从1979年开始的28年中，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效率的改善和人力资本的增长，2008年以后，资本投入成为维系GDP增速的最大动力，同时投资回报率却在下滑。

根据近年浙江各地政府的统计报告，虽然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有所放缓，但土地和房地产收入支撑财政收入的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居民收入增长率有所增加，但是与降低的GDP增长率相较才显得更为明显，因此未来的收入增长并不乐观。

而企业收入，却是名符其实的“输家”。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增长，仅为5.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量的企业员工收入增长成为一个“梦”。

企业的负担，在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在于人力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在于用地成本、各种税负和大量费用，因此，要让民众的钱袋子鼓起来，政府为企业减负，是首当其冲的，效果也是可以立竿见影的，关键在于要落在实处，而非做表面文章，要为企业减大负担，而非去掉秤盘上的小砝码。而同时，居民收入要持续增长，势必导致人力成本在未来继续增长，那么，政府更需要通过实实在在地改变自身

的行为模式，为企业降低成本。比如改变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造成企业用地成本剧增，比如大幅减少各类市场准入审批制度，降低企业的市场准入成本，比如减少向企业征收的各种费用，并采取积极的减税政策。

其次，要改变垄断企业的经营模式。在过去经济陷入困境的几年，银行业却成为发家致富的特殊行业，笔者曾采访过一些企业家，他们纷纷抱怨，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非但不帮助企业，还坐地起价，给企业设置各类门槛和捆绑条件，一些中小企业无法承受民间借贷的高利息，又无法从金融机构得到需要的发展资金，陷入困境。

2013年，国内股市赚钱最多的公司，是工商银行，最能赚钱的公司，是潜能恒信。工商银行前三季度每天净赚7.5亿，16家上市银行赚的钱，比沪深两市其余2418家公司赚的加起来还要多，但16家银行的市值却仅占整个股市的24%左右，市盈率也远低于市场平均值，延续了过去多年“赚钱不叫座”的纠结表现。

当银行在以超低的利息吸收大量的储蓄的同时，却以高昂的利息提供贷款，要知道，中国人口最多的是老年人，他们大部分选择将钱存到银行里，在物价连年上涨的今天，银行存款利息大多跑输了CPI的增长，存款，其实是越存越少。而且我们都知道，统计局的CPI统计数据，是不算房价的，造成大部分年轻人负债的，却恰恰就是最庞大的支出——房子——没有体现在CPI内。

网上有个笑话，说一个“北漂”通过努力，终于在北京买上了房，其中自己出了5万，其余都是父母友情赞助——让人哭笑不得。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一辈人，许多都是靠父母存了一辈子用来养老的存款来买房子，我们又通过按揭透支了未来的钱，那么当CPI又在疯狂上涨的同时，勒紧裤带的，不仅是我们，还有我们的父母。

在目前无法彻底解决商品房价格问题的同时，能够让负债累累的新生代“喘口气”，我认为就是幸福了，更遑论让钱袋子鼓起来。足用已是奢望，更谈什么富余。

所以，能让他们喘口气的，就是那个不算房价的CPI。而CPI，又跟商品有关，跟企业有关，说到底，还是跟政府有关。如果能够减少税负，那么消费者不必为买一个包子、一斤猪肉支付大量由企业转嫁过来的税负，相信部分物价也能得到有效控制，民众的生活成本至少可以降低一部分，就算钱袋子没有鼓起来，但由于物价的稳定或者下降，他们也能喘口气，也能不再勒紧裤带过日子。

所以，我更希望探讨如何让民众、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幸福，日子过得不再拮据，这是国家层面的大课题，如果国家能够从长远出发，不再竭泽而渔，能够还民众以公平，增加百姓收入的同时稳定物价，政府改变财收模式，切实为企业减负，建造的公租房能够让更多人受益，资源分配更加合理，相信幸福才会真正来到每个人生活中，更多的人才安居乐业，享受国家强大的成果。而从长远来看，民富，则国更强。

“藏富于民”应列为基本国策

■ 徐迅雷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实应该是《民富论》。严复翻译的书名是《原富》，后来通行的完整译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经济学圣经”，核心语词即“国民财富”。

国民财富是国民自己创造的。创造经济财富的出发点当然是利己之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自然现象，更是人性本性；个体利益的集合结果，就是国民财富。公众把部分权利让渡给所组成的政府，变成了“权力”，这为的是公共事务，让公共利益最大化。

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这些人被民众称为“官”，自称是执政者、公务员。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权力利益同样会追求最大化。税收由此就可能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结果渐渐变成了“藏富于国”，形成国富民穷的局面。当民主不张，权力失去制衡、官员缺乏有效监管，结果必然会变成“藏富于官”，甚至变成可怕的“藏富于贪官”。许多不同级别的贪官动辄贪腐几千万甚至上亿，就是明证。

国富民穷是国家耻辱。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藏富于民、国穷民富。美国屡屡发生地方政府“宣告破产”的破事，这就是这个世界头号富强之国国穷民富的典型事例。瑞士去岁末发生了一个好好笑的事情：现实在首都伯尔尼，瑞士“全民基本收入”组织的活动家们，很有喜感地将800万枚、共15吨硬币倾倒在瑞士伯尔尼的国会大楼前，表示每一枚硬币代表一名瑞士人；他们向瑞士政府递交申请，要求为每一个瑞士人发放基本工资。由此，瑞士将公投“全民发工资”——即政府拿出一部分财政收入，给每位公民提供固定的无条件月薪，薪金为2500瑞士法郎，约合17000元人民币。

每月拿相当于17000元人民币的钞票，这真叫提高居民收入、让老百姓的钱袋鼓起来，尽管此间还是一个尚未实现的“愿景”。瑞士的富有世人皆知，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但政府的财政收支能力并不“富强”，支出稍有出入便会举债度日。要求公投“全民发工资”，可看作是发出“进一步藏富于民”的呼声。

“藏富于民”的富民学说，对于我国来讲，本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经济理论。先人有“上溢而下漏”之分析：王者之国，使人民富裕；霸者之国，使士富裕；仅存之国，使大夫富裕；无道之国，国库富裕。政府与民争利，正是“无道之国”。

没有藏富于民，实乃现代国家的国策缺陷。国策是指国家执行较长时间，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基本政策。我国列入基本国策的，是计划生育、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科教兴国、对外开放和水土保持。我期待把“藏富于民”列为基本国策，而且要列在科教兴国、对外开放之后的第三位。把“藏富于民”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可谓是在我国“藏富于民”缺失的背景下，应该作出的战略决策，也说明“藏富于民”是一项长期艰巨、任重道远的任务。

关乎藏富于民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产出、拿走（课税）与分配。其大前提无疑是产出——创富于民。刚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报道：2013年度网络作家收入前10名，有4人在杭州。其中有位叫“天蚕土豆”的网络作家，去年仅中国移动电子阅读付给他的稿费就有2000多万。“天蚕土豆”原名李虎，生于1989年，其网络小说代表作有《魔兽剑圣异界纵横》《斗破苍穹》《武动乾坤》《大主宰》等。他这几年写了60本书，每一本销量都在30万以上。纸质书的版税收入不算少，但电子阅读的收入更厉害。杭州还有南派三叔、曹三公子、流潋紫等网络作家，在他们的背后都可以挖出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形成影视、出版、游戏、舞台演艺、文化旅游等等衍生产品，可谓商机无限。

一位年轻的网络作家一年出售电子读物获得的收入就达2000多万，胜过有的企业一整年的总利润。什么叫产业的转型升级？什么叫信息创意产业的创富时代？这就是。老是抱着“重化工”的老脚，只能得个“鸡的屁”（GDP）的好看的大数字，有什么意思。马年还没到来，“马上有钱、马上有房、马上有车……”的“马上体”就开始流行了，“天蚕土豆”告诉你，信息创意产业的创富才有望是真正的“马上有钱”。

“马上体”尽管流行，可是“马上就好”并不容易，广大普通百姓想让自己钱袋子鼓起来的朴实愿望并不容易实现。发展电子商务，发展信息产业，可以说是最接近“马上”的，毕竟现在已是朝气蓬勃的互联网时代。最近连一个网络虚拟货币比特币都弄得风风火火风生水起。早在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就选择了代表千千万万网民的“你”这个概念作为年度人物，其总编施滕格尔认为，互联网上的个人正在改变着信息时代的本质，对于芸芸众生而言，这些网载内容比传统媒体更为及时，更加权威。数字化产出、网络化生存，蕴含着巨大商机和生机。政府在思想上、在政策上真正大力支持发展信息产业，对于创富于民、藏富于民来说，才是事半功倍。

实现“藏富于民”，政府一定要减轻税负，少拿走，多留存。年度财政收入突破十万亿，这光荣吗？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动辄就是天文数字，而征地拆迁的补偿却抠门得很，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这光彩否？放水才能养鱼，血抽干了只会死人，这个道理懂是懂的，可是池塘里只给放半脚水，浅得见底，让你吃不饱饿不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谈何藏富于民。

至于国民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如果没有公平，那么财富只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致使贫富越来越悬殊、权贵越来越得利，那样同样没有“藏富于民”可言。权力的利己化分配，是多年来不争的事实。有的发达国家税率看起来很高，但真正用在了百姓保障上头，实质是“保富于民”。我的旅居法国的

朋友张舒最近发了条微博，说法国的“公平”：“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作为老师每餐要付4.90欧元。完全相同的自助饭菜，一个校工来吃，只要2.40欧元，因为他的工资相对较低。如果你是只拿津贴的实习生，那么你只要付1.70欧元，政府会贴你饭钱。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公平，不管拿多少工资，其实你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有网友跟帖发感慨：“哇，好羡慕啊！在咱们这里，是官越大钱越多，而且越是白吃白喝。”看看我们最广大的百姓，长期缺乏可靠的保障，弄得谁都不敢“吃光用光”，得了几块钱，忙于存银行，结果稀里糊涂就变成了“藏富于银行”、“献富于银行”。

好吧，如果承认“藏富于民”是正路的话，那么，何时能将“藏富于民”列为基本国策？

（作者系九届杭州市政协委员、《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

2013，莪山再出发

题记：桐庐县莪山畲族乡，是杭州众多山乡中从最默默无闻到越来越有名、越来越有特色、越来越受到瞩目的一个美丽山乡。1988年，莪山建乡，成为杭州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乡；2013年，杭州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实施意见”，支持莪山以“三年行动计划”的节奏，“创建‘中国畲族第一乡’”。25年的悠悠岁月，莪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其中，杭州市政协的“力量之手”是莪山畲族乡发展壮大的最大推力。

“我们中门民族村的茭白，喝的是山泉水，住的是泥鳅塘，吸的是清新的空气，非常的受追捧。人家问，为什么这么好的产品不去杭州做广告？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做广告，因为中门茭白根本供不应求哇。”2013年12月9日，莪山乡党委书记江小鹏，对前来研究工作的杭州市政协主席叶明、副主席何关新一行“王婆卖瓜自吹自夸。”“莪山的优质农产品还有很多，除中门茭白外，还有高节竹（笋）、石青山土鸡（蛋）、尧山鄣杨梅、高山番薯（龙须）、红曲酒、石磨豆腐、麻糍、乌米饭、石斑鱼、紫山药、冻米糖……都是又土又‘绿’。”叶明肯定了莪山的特色之路：“绿色农产品是莪山可持续发展的宝贝，但是要增产增收，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不断多起来，关键还要走深加工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的路子。”

莪山是风水宝地。此外，莪山还是一个培养锻炼干部的“黄埔军校”，已经有数位带头人被提拔任用。可是，2012年，桐庐县委的动静有点非比寻常，把桐庐县第一大镇分水镇的镇长江小鹏调往莪山，委以书记之“重任”。

当时有人存疑，莪山虽然“重要”，但是相比之分水，那是小巫见大巫，江小鹏到莪山，会不会英雄无用武之地？

那么，江小鹏到莪山，“武功”究竟是废了，还是强了呢？

莪山“变奏曲”

2013年的莪山，山美，水美，环境美，是美丽杭州的一个缩影。

2013年的莪山，天蓝，水清，人精神，是美丽杭州的一个剪影。

了解莪山的人知道，莪山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分水岭。

第一个分水岭，是1988年建乡以前，那时的莪山，鲜为人知

1988年以前的莪山，是个闭塞的小山旮旯，畲民们主要居住在穷得叮当响的尧山坞村。尧山坞95%是畲民，152户人家共529人。让尧山坞“出名”的不是它独特的风光和独特的人文，而是“男子多光棍，女子无嫁衣”。

那时的莪山，是个“口袋空空脑袋空空”的穷乡僻壤。

第二个分水岭，是1988年至2008年，20年时间，莪山跑步前进

1988年，在杭州市政协的奔走呼吁与大力支持下，莪山畲族乡正式建立，成为杭州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乡。在市政协“换届不换帮扶点”的不间断帮扶和杭州市“千百工程”、“49100工程”、“联乡联村”等政策的庇荫下，莪山开始“洗脑”“健身”，从搬石头造水库开始，一步步通过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生产经营、基础设施建设等起步，路灯亮了，公路通了，荒山绿了，楼房起来了，莪山有了第一所幼儿园，第一所民族小学，第一所规模卫生院，第一所标准型公共厕所，第一个外贸定单，第一家“农家乐”，政

府还把科技送下了乡，让农业有了自创品牌……政协改变了莪山人的心，莪山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2002年，新丰民族村整个村只有2台黑白电视，收视效果很差。解决看电视问题就要开通10公里光缆，匡算起来需要100万元。八届市政协主席虞荣仁誓言‘一定要赶在党的十六大前完成，让畲乡村民看到党的十六大开幕。’在市政协、帮扶集团和桐庐县的共同努力下，村民们义务投工投劳，终于如愿以偿让乡亲们在电视上看到了盛大的‘北京’十六大。”

第三个分水岭，是2008年至2012年的五年，“莪山速度”初现

2007年以来，随着杭州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加大，九届杭州市政协在帮扶上持续发力，以九届市政协主席孙忠焕为带头人的“第三帮扶集团军”加大了对莪山的帮扶投入，确定了“联乡、结缘、结情”帮扶宗旨，规划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2008年，市政协率第三帮扶集团及“关心支持联乡结村帮扶工作单位”，募集了216万元的帮扶资金，投入到了5000亩粮田整治等诸多工程。

这种“点对点”的帮扶，使畲族乡的发展开始从注重“物质”逐渐转到物质、精神并重，弥补了莪山传统文化“荒漠化”的短板。

2012年，莪山乡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1.24亿元，财政收入1759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11863元。

看出来了吗，朋友！莪山25年，不是用脚在走，而是用腿在奔跑，用翅膀在飞翔。25年，仅仅25年，历届市（县）两级政协人、帮扶集团、“关心支持联乡结村帮扶工作单位”等的全力以赴，包括市政协港澳海外委员等的爱心捐助，让莪山人创造了“莪山速度”，或者说是“莪山奇迹”也不为过。

莪山，已经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莪山的蜕变，也是杭州市改革开放、美丽杭州建设的一个典型。

第四个分水岭，是2013年开始的未来3年，打造“莪山神话”

2008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2012年，经济危机这只怪兽的阴影依然徘徊在世界各地，全球经济都不景气，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喜忧参半。

在这种背景下，帮扶工作是继续往日帮扶+项目+人脉的“头人模式”呢——这个模式已经把作用发挥到极致了，还是换位思考，寻找一种再突破再提高的新途径？

特别是，“莪山速度”能否保持？怎样持久？发展的后劲在哪里？目标在哪里？

2012年，十届市政协主席叶明接过了帮扶莪山发展的“政治接力棒”，开始对莪山的“再出发”进行调研和评估。

“2013年初，省委书记夏宝龙调研莪山后，作出了‘莪山要争取走在全省少数民族发展前列’的指示。之后，市政协主席叶明、副主席何关新多次带队来莪山，对莪山现状及未来发展进行调研。经市政协领导倡议并研究同意，市政协向市委、市政府提交了《关于支持桐庐县莪山畲族乡创建‘中国畲族第一乡’的建议》，得到了市委领导的肯定和支持。2013年8月1日，杭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支持桐庐县莪山畲族乡加快发展创建‘中国畲族第一乡’的实施意见》。我觉得，莪山真正迎来了快速发展期。我相信莪山加快发展是有底气的，‘三年行动计划’是可以在我们手上成功的。我们不仅感谢市政协一直把莪山当作掌上明珠，25年始终如一帮扶，更感谢市政协再次帮助莪山抢抓到历史发展机遇。”

江小鹏对杭州市政协的“感谢”，透露出的信息，就是莪山真的遇到了又一个“历史机遇期”，而且稳稳地抓住了。

莪山的发展，帮扶力量从市政协的帮扶“集团军”已经擢升为杭州市的战略“大会战”。

莪山“神曲”

晒晒莪山2013年的成绩单

在莪山龙峰民族村，有位67岁的老太雷阿仙，丈夫长期卧病在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儿子车祸去世，媳妇远走他乡，膝下有一位14岁上学的孙子。莪山乡党委政府非常关心雷老太一家的生活，帮他们办理了低保，修通了家门前的路，时任莪山乡党委书记盛春霞还为孩子专门联系落实了一所可以学技术的中专，市政协主席叶明更是亲自与他们家庭结对，鼓励老奶奶和小孙子“要相信党和政府，树立信心，勇敢生活，努力上进。”雷阿仙是个非常坚强的老妇，不仅操持家务，勤俭持家，还力所能及地干些农活，自强自立。她14岁的小孙子称得上是“莪山好少年”，不仅用功读书成绩斐然，还坚持每月从自己仅有的几元零花钱

中省下2元钱，用来买礼物去看望孤儿院的小伙伴，与他们“结对帮扶”，彼此鼓励。雷阿仙祖孙俩对生活的热爱、对爱心的传承，代表了新莪山人不怕苦、不畏难、爱拼才会赢的精神。

“在桐庐县14个乡镇中，我们莪山乡还属于欠发达乡镇，经济一靠工业二靠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没有像样的集镇，干线窄，弯道多，斜坡陡，没有初中，乡卫生院档次低、村卫生所有名无实，体育设施空白，民族特色氛围不够浓。2012年，莪山人均年收入11863元，低于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552元。但是我们有底气，2013年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46个畲族乡中位居前三甲。我们有潜力、有实力，更主要的是有杭州、桐庐两级党委、政府、政协的‘靠山’，有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完成三年行动计划我们很有信心。”

2013年，为实现“三年行动计划”，就连莪山乡民族幼儿园的老师们都在试图通过“莪山宝宝”音频卡通玩具等的开发，让孩子们也投身到“三年行动计划”的建设之中。整个莪山人的精神面貌，则可以用“扬鞭催马奋自蹄”来形容——

2013年，莪山的工业在转型升级上做出了点样子。比如桐庐博艺针织，投入180万元引进了30万打针纺小三件流水线技改项目，实现了传统针纺产业转型升级，此外，组织了4家‘规上针纺企业’加入阿里巴巴桐庐针纺产业带，带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农业产业方面‘动静’很大。扩面了200多亩高节竹、100多亩茭白，推广了高节竹覆盖延期增产和喷灌技术，使得示范区亩增效500元以上。

旅游方面，实施了“莪山大院”建设项目，并逐步打造畲族古村民宿产业带。

基础设施方面，完成了畲乡演艺广场、入乡口景观提升改造工程，莪溪小流域农业生态工程、莪山民族文化休闲广场。

传承畲族文化方案已经联合中国美院、浙江工业大学等设计单位，围绕畲族文化元素进行目标提炼，举办了畲族文化workshop设计创新营，完成了畲族历史传说、民风民俗、公共设施小品、文化小品等系列畲族主题设计项目，举办了第四届“三月三”畲族文化节、第三届畲歌大赛，还成功申报了畲歌及红曲酒酿制省级非遗传承人项目，完成畲族文化展示厅建设等。像雷竹彩、廖阿根、周根海这些畲歌、红曲酒、畲乡武术的传人，已经成为各级政府要保护的名人了。

2013年，重新出发的莪山，脚步坚定，目标坚定，信心坚定。

这一切，得益于杭州市政协【政协杭委〔2013〕12号】《关于支持桐庐县莪山畲族乡创建“中国畲族第一乡”的建议》和中共杭州市委【市委办〔2013〕6号】《关于支持桐庐县莪山畲族乡加快发展创建“中国畲族第一乡”的实施意见》。

看看政府部门的“成绩单”

支持、鼓励莪山创建“中国畲族第一乡”，杭州市如何支持？如何行动？文件精神落地了吗？

我们先看看2013年创建工作的“大事记”——

组建了班子。杭州市成立了支持创建工作协调小组，威哮虎副市长掌组长帅印，何关新副主席执常务副组长之大印，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各一位副秘书长和市政协经农委主任挂帅副组长，15个政府、政协的部门“首脑”为班子成员。

布置了“作业”。2013年9月11日，支持莪山创建“中国畲族第一乡”工作协调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2013年11月25日，市政协代拟并印发《关于建立支持莪山创建“中国畲族第一乡”工作机制的通知》；12月15日，工作小组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

迈出了步子。要打造“中国第一”，没有“金字招牌”是不行的。“2013年至2015年，在保持原有扶持项目资金、扶持渠道和力度不变的基础上，市本级每年安排5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同时，市农口系统要通过项目形式予以特殊倾斜，交通、教育、旅游、文化、医疗卫生等专项资金也应给予倾斜支持。桐庐县财政原则上按市级帮扶资金实行1：1配套。”

2013年3月，市财政局通过体制结算拨付给莪山500万元，2014年还将继续按照市委文件精神，落实好专项支持资金；市农办在统筹城乡发展专项资金中，拿出500万元用于莪山新农村建设，还把莪山村、中门村、新丰村列入中心村、精品村进行重点培养；市林水局、农业局结合高节竹病虫害防治及低改提升、防治色

彩林业、龙伏溪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整治等诸多项目给予资金补助；市科委积极支持莪山高节竹覆土延长笋期增效示范和推广项目。

市环保局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行补助。

市交通局安排配套资金补助区块道路交通改造，桐庐县交通运输局还投资实施了徐七线沿线绿化景观提升工程。

市教育局帮助莪山乡小学建设教育信息化项目。

市民宗局落实敲定了每年的帮扶资金，完成了莪山村、中门村、新峰村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扶持资金的认定和分配工作。

“市文广新局指导建设民族文化广场，指导完成‘红曲酒酿制技艺’和‘畲乡民歌’进入省、市级非遗保护名录等。”

2013年的莪山，如一艘鼓满了风帆的战船，向着光明灿烂的目标，在杭州市委市政府的领航、市政协的护航下，重新出发。

后记：畲文化到底是怎样的？当我从工作角度去看那些寥胜于无的历史记载，想象的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感觉的瓦解。她在悄无声息的消融中，找到了一种以极度边缘的位置去平衡世界的智慧。迁徙至此的族人，刻意的卑微和将自我单独放在一处深山密林的闲置空间所产生的那种张力是独特的。今天的莪山，畲文化始终处于谦逊的位置，她来自于适度的边缘化、此处滋养的特殊文化感觉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经历带来的一种能平静地面对世界的姿态。我很幸运生在这样一个地方，这里鸡群悠闲觅食，茂林云雾撩人，从空气中可以觉察一种温柔的力量，远远超越了对奢华、昂贵、狭隘的束缚。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向世界张开我的耳朵。在此种下我感觉的根：“此处无虚饰，——畲文化·畲生活”，我想看到她们无限细小的根须在这片土壤中密集生长。——摘自莪山乡少数民族副乡长雷晓华微博

留住历史足印 传承城市文脉

——杭州市政协文史工作坚持特色开拓创新结硕果

■ 孙奕

位于杭州北面的良渚遗址，是一个距离现在5000年的文明见证。日前，在市政协主席叶明的关切下，杭州市政协文史委正组织各路专家、学者积极调研，助推良渚遗址在2016年获得申遗“入场券”。

事实上，近些年来，从西湖的申遗成功到运河的积极“备战”申遗，可以说市政协文史委员会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积极参与西湖综保、运河综保、中山中路综保等一些列城市建设重大工程，在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的同时，充分挖掘和展示杭州的历史文化，不断为城市景观的申遗寻找文化的闪光点。

是什么让一个地方政协的专委会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可以用文化的线符将古城、湖山、古河道串联，让城市延续自身的DNA，并让世界对这个良好的基因予以肯定？是创新的力量。

拾湖山之遗

——新机制创造新优势

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评价西湖普遍价值时作了这样的总结：优雅而不失灵动、平淡中蕴含变化万千的文化魅力和美学境界。在巴黎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5次大会上，“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新的世界遗产名录。

西湖被界定为一个文化湖。

在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建设中，杭州市政协主持了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和论证工作。可以这么说，西湖“申遗”成功，杭州市政协功不可没。

为更好地挖掘西湖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在走访调研的过程中，市政协文史委与杭州市档案局、

市社科联、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方志办建立良好的协商沟通机制，形成社会合力。他们寻访遍西湖的山山水水，编纂了《悠悠杭州》、《西湖文化》、《杭州名人名居》、《湖上拾遗》等系列西湖丛书，以严谨学术态度呈现西湖的精致内涵；他们身体力行，直接参与了于谦祠景区的保护工程；他们建言献策，提交了《关于西湖环湖南线景区整合工程中有关文化景观内容的建议》、《西湖西进历史文化内涵论证会会议纪要》、《关于苏小小墓、武松墓重建问题的情况报告》等多份有分量的材料。

为提高史料的利用价值，使主题突出，集中地为现实服务，市政协文史委创建以课题为载体的哲学社会科学招标机制，提升学术水平。湖是城的内涵，而城是湖的外延。西湖申遗势必离不开杭城的文化给养。2008年1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启动了中山路综合保护与有机更新工程。为了更好地推进这项工程的开展，还老杭州一条真实、古朴而熟悉的中山路，市政协组织委员和专家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整理中山中路沿线建筑的历史资料。对每幢老房子，逐一调研。走访老杭州、老工商业者及其后裔，赴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收集到了众多关于中山路历史建筑、原工商业者和业态发展演变等第一手珍贵资料，并据此撰写了《中山中路的历史建筑与商业文化》一书，终使这条历史街区修葺成为“活着的民国化石”。与此同时，市政协文史委还与社科院规划办合作，集中火力，推出民国杭州研究课题招标公告，有30多项课题参与申报，经过评审，20个课题入选，先后出版10多部高水准的学术专著，不少突破了杭州文史研究的原有领域，具有开拓性。

为促进文史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市政协文史委创建规划引导机制，使各项工作凸显了前瞻性和计划性。2014年，将是杭州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年，这是继西湖申遗成功后又一件申遗盛事。早在2002年，杭州市政协就意识到挖掘和展示运河文化的重要意义，积极组织委员和有关专家对运河的保护和整治展开深入的调研。

2009年初，杭州市政协主持编辑的《杭州运河文献集成》出版，共5大册260万字；2009年10月，《运河名城——杭州》出版，为全国政协“运河名城丛书”开卷之作；2011年，杭州市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杭州运河史》出版，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阐述杭州运河历史的专著。这些成果，展现了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揭示了运河对杭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也对研究、治理和开发大运河提供了一套可参考和借鉴的资料。对于杭州市政协来说，这本书更是他们为运河“申遗”所作不懈努力的重要一部分。

撷史林之英

——新平台拓宽新领域

2007年明代杭州暨于谦生平事迹学术论坛，2009年民国杭州研究学术论坛，2010年元代杭州研究论坛，2011年“辛亥革命与杭州”研究论坛……这几年来，杭州市政协文史委依托杭州市政协领导下的杭州文史研究会为平台，团结国内文史专家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无一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以专题研讨和学术论坛的形式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已然成为杭州市政协文史工作的一大特色。

除了依托杭州文史研究会这个自有平台，市政协还看中国字号协会拥有社会资源广、科研水平高、人才集中等优势，与国字号历史文化研究协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对深化文史工作内涵、扩大社会影响具有显著的作用。

元代杭州是什么样的？蒙古人统治下的杭州，为何被誉为“天城”？马可波罗为什么会来到杭州？最早标注有“行在”（杭州）的西方古地图透露着什么样的信息……这些问题，对于每个杭州人来说，都是那么的奇特，又那么地渴望了解。2010年元代杭州研究论坛借力“国字号”，就帮助解开了这些谜团。

在论坛上，元代杭州研究的先行者、浙江大学黄时鉴教授，作了“马可波罗游记与西方古地图上的杭州”的主题发言，展示了他的新发现——正是在马可波罗记下Quinsay，并对它做了大

量描述以后，杭州才开始受到西方人的注意，并被明显地标注在西方人绘制的古地图上。一幅幅色彩鲜艳的古地图揭开了元代杭州600年尘封的辉煌，对于今天杭州的“生活品质之城”建设来说，亦是一种启迪与传承。

15年来，市政协搭建文史平台、汇聚国内外学术力量，围绕于谦、杭州运河以及元明和民国时期的杭州，组织开展学术研究，形成了《于谦研究》《杭州运河史》《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Quinsay：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明代杭州研究》和“民国杭州研究丛书”等30多项共160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省市社科重点规划课题，极大地促进了杭州历史文化的研究，丰富了杭州文化建设的成果。

近期，杭州市政协又组织国内外一流学者成功破译了杭州凤凰寺所藏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墓碑文，更是成为该领域学术关注的焦点，具有国际学术水准。

溯峥嵘岁月

——新理念成就新突破

政协文史资料具有“三亲”特色（即亲历、亲见、亲闻），它记录了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对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第一手资料。杭州市政协始终坚持把“三亲”史料征编作为文史工作的重点，秉承政协文史工作“利在当下、功在千秋”的理念，创新思维，与时间赛跑。“三亲”史料征编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根和魂，也是政协文史工作最鲜明的特色所在。

翻阅报纸，经常会看到市政协文史委征集“三亲”史料的启事；2011年的市“两会”期间，市政协文史委还向全体委员发了一份《关于向全体与会人员征集“三亲”史料的函》，定向征集文史资料。近年来，“三亲”史料的征集面和征集途径也在逐步拓展，通过网络征集就是近年来拓展的新方式。

正因为创新理念，努力不懈，杭州市政协平均每年有2部史料翔实、社会评价度高的“三亲”史料图书面世。

由九届杭州市政协主席孙忠焕撰写的《在时代洪流中——我所经历的那些事》一书出版后，得到全国政协、省政协和社会同行的高度评价，被评为全省政协优秀文史图书特别奖；《嚶鸣录——杭州市人民政协改革开放30年记忆》以“三亲”史料形式记录了杭州市政协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取得的成就，这一工作创新得到了全国政协文史委领导的赞扬；《难忘的岁月》一书出版后，更是在当年的知识青年群体中引起强烈共鸣。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古为镜可以见兴衰。研究以挖掘有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核心内容的“三亲”史料，其出发点是更好地服务现实社会。

翻开2011年出版的《新中国杭州工业发展记忆》一书的前言，读到这么一段沉甸甸的文字：“这些记忆，或许不够全面，但可以帮助我们共同回忆杭州市工业发展所走过的路程，记住杭州工业发展历程中不可遗忘的人和事，同时可以传承工业先驱辛勤奋斗凝结的‘工业之魂’，为杭州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不竭的力量之源。”

杭州市政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和论证，编辑出版了文史书籍。如市政协近年来出版的文史书籍，每部都与我市文化名城建设相结合；每次文化论证的主题，都契合市委、市政府迫切需要推动的工作。

让主体活力竞相迸发

——市政协委员“岗位建功、履职为民”进行时

■ 周方

2012年12月10日晚7时，第57届联大会议期间，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杭州西湖佛教文化的摄影作品展，吸引了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联合国新闻、世界日报、侨报等中外重要媒体的参与并做了专题报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笔致函影展作者，称赞其作品“体现了我们在当今世界面临许多复杂问题时必须具有的精神”。2012年底，杭州市在全国

率先推出“智慧医疗”服务，并在市区三家医院试点不同的“先诊疗后付费”的智慧结算方法，免除了患者看病与付费多次排队的麻烦，每年近1000万门诊病人从中受益。目前该就医模式已覆盖全杭州地区，更多的市民告别了看病与付费多次排队之苦。这两件表面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背后，都活跃着同一个人的身影——市政协文艺界委员张望。他11年历尽艰辛的持续拍摄创作，完成了对西湖佛教文化的摄影，经过曲折而长期的联系与申请，最终获得联合国总部的重视与支持，《中国杭州西湖的佛教文化——张望摄影作品展》得以在联合国总部顺利举行；他密切联系群众、认真倾听界别群众的呼声和诉求，提交的提案《关于市民看病就医难的整改建议》，得到41位市政协委员的附议，并经过他持之以恒的坚持和沟通磋商，使得市、区两级医院及社区医院的“先诊疗后付费”的智慧医疗就医措施得以顺利推进。在杭州市政协505名委员中，类似于张望这样的，既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又在政协履职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还密切联系界别群众，为百姓诉求、民生热点鼓与呼的委员，并不在少数。如抱着“工作者，是美丽的”信念的教育界委员、滨江区学前教育管理中心主任黄美丽，坚持每年全会前通过局域网向本系统全体职工征集提案社情民意线索的工会界委员、市水利设施监管中心高级工程师林蔚……

而这一切，与市政协十届一次、二次会议来所作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密不可分。

化压力为动力：政协主动作为

2013年7月，市政协正式下发文件《关于开展杭州市政协委员“岗位建功、履职为民”活动实施意见》，在全体市政协委员中部署开展“岗位建功、履职为民”活动，要求广大委员联系各自工作岗位特点，发挥岗位优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争创一流业绩，为“美丽杭州”建设和促进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

催生这一活动的背景是：市政协自2012年换届以来，从政协领导、界别小组召集人、政协委员，到政协机关干部，都普遍感到政协工作的责任和担子更重了。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政协组织越来越高的要求和期望。如何化压力为动力，有效回应社会和公众对政协组织和委员的期盼，回应各界别群众的诉求与呼声，更好地发挥政协职能和委员主体作用，让各个界别的优秀委员在本职岗位和政协履职活动中脱颖而出，是市政协领导集体一直在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和实践，现在市政协领导集体的答题思路已经越来越清晰，解题措施也越来越具体：要充分发挥委员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首先要提高委员的履职能力，提升委员“话语”的含金量，还要让委员有资格、有平台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协事业。正如市政协主席叶明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的那样：“衡量一个地方政协工作的实效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协委员的作用发挥及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以及在当地群众当中的口碑”。政协履职，就是要充分体现出政协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作用，就是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在本职岗位中的带头作用、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在界别群众中的示范代表作用。

为此，市政协十届一次、二次全会提出，要组织和带领全体市政协委员广泛开展“岗位建功”活动，并于2013年7月正式下发文件，全面部署活动的开展。

建制度促规范：委员主动履职建功

“如果政府能够考虑适当调整廉租房政策的要求，让我们这样的外来务工者也能享受这个政策，那我真的就满意了”，来自湖北省天门市的37岁的外来务工者熊志胜，在向主动联系他的政协工商联界委员陈建华反映，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像他这样既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又很难享受政策照顾的企业普通员工，能够住上政府提供的廉租房。

2013年，市区范围内有近70条道路要施工，本就拥堵不堪的道路交通形势越加严峻。临近年底，杭州城东的风起路、秋涛路又开始施工，让市区尤其是城东的交通进入了煎熬期。市政协唯一的“的哥”委员周震，利用工作之余的空隙时间，又与他的几位朋友、工作中的伙伴

凑到了一起,用他们“常在路上”的职业眼光,交流探讨缓解之策,希望能为治堵出一份力……

委员自身主动联系界别群众,积极反映群众诉求和呼声是一方面,政协的制度化推进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早在2012年底,市政协接连下发关于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和政协委员参加所在地基层政协活动的文件,要求每位委员除加强同本界别群众的经常性联系以外,还应至少固定联系5名本界别群众,每年通过谈心谈话、意见征询、情况通报、信息反馈等方式,做好联系界别群众的各项工作。并要求每位委员除参加市政协组织的履职活动外,还要深入辖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开展履职活动,积极参与当地政协邀请参加的活动等,更进一步密切政协委员与界别群众和辖区基层的联系,使政协履职更接“地气”,更有针对性。活动部署后,市政协各界别小组迅速行动,在要求委员结合各自工作,立足岗位创业建功的同时,纷纷结合界别自身特色和优势,精心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履职活动,帮助委员更好地履行职能。如民进界别组,发挥界别文化教育优势,积极配合“美丽乡村”建设和文化强市建设开展的系列社会服务和文化宣传活动。民革界别组,以“同心·博爱”社会服务品牌建设为抓手,组织委员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民建界别组,注重发挥委员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针对杭州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深入调研,积极献策;教育界别组,组织委员对农村教育工作现状开展调研……

这一切,都离不开市政协的正确引导。根据“岗位建功、履职为民”活动《实施意见》,各界别委员要根据所在界别,按相关要求参加活动,比如从事经济工作和企业界的委员,要按照实业兴市战略,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坚持对创新实践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以创新促发展;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委员,要按照城乡统筹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部署要求,着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合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对从事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工作的委员和来自党派团体、民族宗教、港澳台等界别及党政机关单位的委员,《实施意见》也都有比较具体、明确的要求。

强意识调热情:激发委员主体活力

2013年8月,市政协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如火如荼进行。为更好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市政协党组成员主动向委员问计。市政协党组全体成员通过市政协门户网站“委员直通车”论坛板块,与委员们进行了网上恳谈,在委员中引起热烈反响。11月下旬,结合明年政协工作思路谋划,市政协又在门户网站上还开展了为期一周的“2014年度政协工作思路网上谈”活动,向全体市政协委员、特聘委员和政协参加单位征求意见。近70位委员和单位参加,提交了数百条建议。叶明主席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在明年的工作思路谋划中积极吸收采纳委员意见建议。

不仅仅是向委员问计,市政协还先后出台文件,要求市政协领导主动加强与委员的联系,听取委员对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如要求每位市政协领导每年走访委员人数一般不少于所联系界别委员总数的30%;开展“走访委员听心声、凝智聚力促发展”活动,市政协领导分批走访委员,听取委员意见,对委员遇到的问题,及时向市有关部门反映,积极协调解决;建立市政协有关部门、界别小组与市党政有关部门之间的对口联系交流协商制度,组织委员与党政部门就一些领域的行业性、专业性问题开展对口联系交流协商等。

“政协委员的身份是荣誉,更是责任”。市政协主席叶明特别指出,委员意识不仅仅要体现在出席政协会议时,在平时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同样要牢记委员的责任和使命,履行好委员的职责。委员来自界别,是界别的代表,是各个行业的精英和标杆。委员的标杆作用,主要取决于委员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增强委员的标杆意识,坚持立足岗位创造一流业绩,才能更好地展示委员风采,凝聚界别群众。

委员能否更好地履行职能,发挥主体作用,界别小组的“幕后”组织协调是关键。因为界别工作的特色,也是需要通过界别日常活动的开展,通过界别组织委员开展好履职活动,

发挥好主体作用来体现的。为更好地体现界别特色，促进界别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学习借鉴，市政协十届二十四次主席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市政协星级界别小组评选办法和优秀政协委员评选办法，把界别组织开展“岗位建功、履职为民”活动情况、委员参加活动表现，作为评选重要依据，以此来调动界别和委员的参与热情。

重结合谋共赢：让“1+1>2”

管理学理论认为，有效管理总能带来“整体大于部分”的效果，即通常所说的“1+1>2”。一个组织，依靠团队合作，寻求共同目标，能够求得共同发展。为提高活动的实效，市政协十分注重活动的结合，明确要求将活动与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与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参加区、县（市）政协活动等相关制度的落实结合起来，与界别协商、界别与党政部门对口交流协商等活动结合起来，与政协各阶段重点工作的开展结合起来，同步推进，力争实现“1+1>2”的效果。

2012年9月18日，在市总工会四楼会议室内，一场由市政协工会、工商联界别委员唱主角，市人力社保局和市经信委等政府部门负责人参加，关于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主题的界别协商会正在召开。这次界别协商会的规格很高，市政协主席叶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胜，市政协副主席张鸿建、何关新、张必来等五位市领导出席，因为这是市政协首次举办的界别协商会。会上，市政协工会界别和工商联界别，就建立两界别之间的协商、互动和联系工作机制，以及《杭州市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草案）》等进行界别协商、征求意见。代表资方和劳方的委员共聚一起，就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代表、程序、标准、范围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很多观点双方是针锋相对，言辞也不乏“火药味”，但委员的发言始终是坦诚的，会议的气氛始终是热烈的，双方都围绕各自界别群众的呼声和诉求，为做好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开展民主协商，建言献策。

这次工会、工商联界别协商会，为进一步做好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起到了很好的畅通民意、增进共识的作用，初步形成了“整体大于部分”的效果，市政协主席叶明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强调要进一步探索界别内部、界别之间、界别与党政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和方法，丰富和完善界别协商的形式，提高界别协商的规范化、组织化水平，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民生的长远性、全局性、前瞻性课题，积极让界别协商真正成为委员履行职责、发挥主体作用、促进政协政治协商和党政部门广泛听取意见、增进共识、推动科学决策的重要平台。

在本职岗位上，为社会服务；在政协工作中，为百姓尽职。这是众多市政协委员发自内心的声音，也是市政协委员群体在诸多市民群众中的印象。正如民革界委员、钱江工业集团董事长张涌森所说：“身为一个企业家，我是为员工服务的，不断创新，把企业做大，让员工过上好的生活，有好的归宿；身为政协委员，我是为社会服务的，认真为民履职，不搞花架子，不放礼花弹，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和谐美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

市政协主席叶明

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在春节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市政协主席叶明来到上城区小营街道城站敬老院和困难群众家庭，走访并看望老年人、困难职工和智障残疾人，送上慰问金、慰问品，并致以新春祝福，表达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爱之心。叶明一行首先来到佑圣观路三益里8幢前的小营街道城站敬老院，给老人们拜早年，嘘寒问暖，感谢他们曾经为国家发展和建设付出辛勤的劳动，祝愿他们健康长寿。随后，又来到一位姓陈的困难群众家中进行慰问。该困难群众因年龄偏大，目前失业无收入；妻子退休，患有糖尿病，退休工资仅1900元左右；他们的儿子患上急性白血病后，家里的经济更加困难。叶明一行为他家送去了年货和慰问金，鼓励他继续为孩子治病，增强信心努力度过难关。

该困难群众表示，非常感谢街道、社区一直以来的帮助，自己也会不断努力，好好报答社会。之后，叶明一行还慰问了其他困难家庭。

市政协副主席、市文促会主席张鸿建

赴澳门走访在澳委员

1月7日-9日，市政协副主席张鸿建赴澳门参加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会议，出席凤凰卫视录播的“2013中华文化人物”颁奖典礼，并走访看望市政协在澳委员。张鸿建走访了侨光集团投资部总裁、市政协在澳委员虞雪莱，会见了澳门侨光集团董事总经理王世民。并与在澳委员虞雪莱、施人玮、贺培浩、冯倾城和九届委员老显光进行了座谈交流。

市政协副主席何关新赴临安市走访调研

1月7日，市政协副主席何关新来到临安市太阳镇双庙村，走访市政协委员、科地财富董事长陈刚，实地探访陈刚委员通过土地流转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体制探索的“太阳公社”项目。何关新与项目负责人、当地村民开展座谈交流，详细听取了项目运行情况介绍，肯定了陈刚委员投资农业、探索农村发展模式的做法，并对项目的后续推进提出了意见建议。经协商，确定将此项目作为市政协经农委研究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联系点。

瑕瑜互见 前景可期：

免费高速那些事儿

■ 刘建华

相比其他年份，2012年的国庆节注定是一个要更被人们经常提起的日子，这一年的国庆节假日期间，免收小型客车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政策正式落地实施。

免收通行费，可以降低公众假日出行成本，提高公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促进假日经济，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也受到了公众的一致欢迎。

瑕瑜互见：免费高速之利弊

说起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它的意义不言而喻，对此，很多人有话要说。

蒋建民（富阳市政协副主席）：重大节假日叠加了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利好，引发了“自驾游”热潮，这无疑是我国交通史上的一次“节运”大考。改革一小步，引发社会大关注。对于节假日高速公路的免费通行政策，社会各界普遍叫好，纷纷为这一政策带来的积极意义拍手称快。

王登承（农工党杭州市委会）：无可否认它提振了假日经济。交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9月30日免费首日，全国道路旅客运输量8560万人，同比增长13.3%；10月1日-6日，全国道路旅客运输客流量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1%、9.1%、7.9%、7.6%、8.1%、7.6%；黄金周北京、上海等地的高速公路车流规模同比增长30%-70%。出行人数的增加直接带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徐逢贤表示，高速路免费后，一方面直接降低了民众的出行成本，减轻了民众旅游负担；另一方面，虽然短期内由于免费使得国家损失了一部分财政收入，但却极大地刺激了各地旅游市场，并带动相关配套设施的发展，总体来看，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较大。

处于试水阶段的高速路免费政策也带来一系列问题。配套滞后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拥堵。据不少车主讲，车辆从进入收费站前减速，到停车拿卡通过，最后加速离开，整个过程大概要1至2分钟。尽管后期交通部门紧急取消了发卡政策，但拥堵现象改善甚微，免费没有为假日增添喜悦之情，反倒频添了诸多烦恼。

与拥堵相伴而生的问题也不在少数，车禍事故频频发生，高速路沿线垃圾成堆，加油站、公共厕

所、服务区停车位等配套公共设施滞后……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为民惠民好事预期中的“多赢”效果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有所折扣。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实施1年多以来，叫好鼓掌、拍手称快者大有人在，质疑喊堵者亦有之，客观说来，制约瓶颈犹在，效果却也差强人意。别着急，免费高速之路要越走越宽广，毕竟还需要不少配套。

完善配套：免费高速之思考

如何让“免费路”更好走？完善的配套措施必不可少。

与假日制度改革配套：春节，免费通行时间适当提前。

蒋建民：高速公路应根据具体情况放行免费通行车辆。建议参考国外限制放行或按照最小间距放行方式，让即使免费通行的高速公路也能享受到不打折扣的“高速”服务。同时，加速技术改造，使车流统计等工作更加快速，加快自动化进程，增强高速公路沿线服务能力和应对大量车流人流的应急能力，比如加大对加油站、公共厕所、服务区停车位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从长远看，作为全国假日制度的“从属制度”，公路小型客车重大节假日免费政策日后也应当与假日制度的改革与时俱进，更加适应民众日益高涨的深度休闲需求。比如可考虑配合带薪休假制度，尝试对符合免费资质的小客车任选免费时段等，以实现真正的错峰出行。

方鸿琦（民盟杭州市委会盟员）：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自然会有比其他节日更大规模的返乡潮；再者，按春节传统，一般都要提前返乡，一些单位提前放假，有些路远的也请假提前回家，到除夕那天才开始免费的政策，惠及面相对较小，没有起到政策制定所预想的效果；春节期间集中出行，容易造成拥堵，加上冬季天气的不确定，无形之中，增加了许多不安全因素。为此建议，春节免费通行提前一天至三天，各省可根据具体情况提前做好安排，让好政策真正惠及更多的群众。

笔者注意到，近日，多个省份已明确宣布，2014年除夕高速照常收费。但上述意见则进一步表明：长期以来，民众对带薪休假、自由休假的渴求甚深，如能和免费高速政策配套实施，相得益彰，是不是具有可行性？值得探索。

反弹琵琶，免大车不免小车

王登承：要避免和减少节日的免费细则。免大车不免小车不失为一个比较理想的办法。在道路资源与汽车保有量不相匹配的前提下，保证公共交通出行有利于环保，有利于低收入群体，也有利于集约。

免大车不免小车，可以降低客运和货运行业的运营成本。所谓大车基本分为两类，即客运和货运。如果实行免费，相当于间接地给予这些用于经营的个人或公司予以免税，降低了客运和货运两类车辆的运营成本。当下物流行业成本过高，“免大不免小”政策如能出台，对该行业必定是有好处的。

蒋建民：扩大重大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车辆的范围确实很有必要。与小型客车相比，客运大巴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占道面积小，人均耗能低。若实行免费，不仅可降低通行成本，提高道路运输效能，还可降低部分小型客车车主自驾出行意愿，转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就如城市交通提倡发展公交一样，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也应将公共交通车辆纳入其中。

王登承：如将大车也纳入免费范围，有不少人外出便会采取公共交通的方式，既能节省不少交通方面开支，也能提高在目的地的消费，同时，对目的地城市的交通影响也相应减小，对缓解目的地景区的人满为患、车满为患也大有裨益。

目前的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政策，受益群体主要是购买了私家车的一部分民众，而广大的低收入人群却无法得到实惠。改为大车免费，则能通过降低节假日客车车票、旅游整体收费等途径，为广大低收入群众减轻出行负担。

前景可期：免费高速之未来

高速公路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务社会，服务民众。免费通行，让公路“回归”公益属性当

是高速公路发展必由之路。

蒋建民：相对于重大节假日的免费通行，群众更期待长期的免费通行政策。真心希望以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实施为契机，推动我国交通运输体制大改革。

郭清晔（杭州市政协委员，民建杭州市委会副主委）：不少委员反映，定价高、收费年限长的“天价过路费”是对道路公共属性的一大损害。据统计，目前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运输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9%以上，分别高出发达国家80%和50%。中国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1/3，间接成为物价上涨的重要推手。

不少政协委员据此建议，各级政府应作出承诺，明确在什么时间前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而不是现在含糊的“逐步取消”。

高速路、桥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回归公益属性？问的是政府的智慧，问的也是政府的责任和勇气。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高速公路通行费打开了一个缺口，也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改革不会止步。

绕城高速，免费通行，好处多

刘英团

高速公路节假日免收通行费这一“免费午餐”，公众已经吃到嘴了。虽然只是节假日期间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虽然免费的高速公路是否包括各地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各个城市的绕城高速公路，取决于各省（区、市）政府的决定。但是，从人文关怀、以及“共享发展成果”这一角度出发，绕城高速免费是必须的。

高速公路收费，是一个很大的民生问题。民意吁求多年，从2012年中秋节开始，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通行日已成“定制”。几个重大节假日加在一起，相当于政府给公众发了一个200多亿元“大红包”。高速免费之所以广受欢迎，背后体现的是公众对高速公路收费改革的期待。

数据显示，中国当前高速公路收费总里程世界第一，几乎是所有欧洲国家高速公路收费长度的总和。目前，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已常态化，与高速公路配套的绕城高速自然也应当免费。绕城高速路免费通行，对一个城市的发展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及杭州不再仅仅是指主城区范围，一个大杭州的版图已经融入每个人的生活。若再将绕城公路圈按高速公路标准收费，就与目前的现实发展有一定的脱节，也可能造成道路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大杭州的发展。对于这一点，国内很多大城市早就做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如，北京、上海、郑州、成都、沈阳等多个大中城市的绕城高速路都是免费通行的，就连一些小城市也在酝酿免费放行。绕城高速免费通行，不仅对杭州的交通起到更大的分流作用，还能带动郊区的房地产、餐饮、休闲等行业的快速发展。绕城高速公路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缓解城区的交通压力、分流车辆，杭州绕城高速收取通行费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正如一些网友所言，如果绕城高速对杭州乃至浙江的车辆免费放行，那它发挥的作用将比几条、几十条高架路的总和还要大。调研表明，杭州绕城高速公路的收费，已对杭州的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效应。

程新杰（民盟）委员在调研中发现，自取消四自工程费“统缴卡”后，原来每天走绕城线路的一批上班族，因为走绕城每天来回收费，现在改为走城区线路，让原本拥挤的城区交通更加繁忙。赵才苗（民盟）委员也认为，绕城高速收费限制了杭州的发展。由于杭州城区的房价高，不少市民到市郊购房。但是，全年过万元的绕城高速费用，既加重了民众的生活负担，也影响到今后的人才引进。目前，已经有很多人选择从城市内部道路驾车通过，致使本就拥挤的城市道路“雪上加霜”。绕城高速作为一条使用率很高的城市道路，连接余杭、下沙、滨江、萧山等地，不仅关系到无数企业、百姓的生产生活，更关系到整个大杭州各城区的联系与发展。

尽管杭州绕城高速有其独特性，即“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但是，高速公路属于公益事业。尽管杭州绕城高速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吸收民间资本，但杭州绕城高速终究还是以政府投资为带动

性投资，由杭州市政府出资建设，资金来源是广大市民的纳税费用，不能丧失其公益性。没有公益性的高速公路，只能变成一些利益集团的牟利工具。正如赖勤委员所言，绕城高速是否免费问题，“从小处着眼是城市交通问题，从大的方面看更是一个城市的民主问题、民生问题。”取消统缴卡政策，结束了“不办卡不落户，不续费不过年检”的强制捆绑式缴费，是个不小的进步。但是，高昂的通行费用，把更多的人挤到城市道路上，最终导致杭州的“城市病”越来越重。公共设施的公益性，体现为公共利益，在高速公路上，公共利益又体现在每部车辆、每趟行程中。无论什么情况，公路的基本属性都应该是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即使有社会资本投入。从性质上看，社会资本的投入是一种“特许经营”，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依法保护，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公益性和服务性更要切实体现，尤应体现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倘若取得公路经营权的企业只是一味的收费盈利，那就是对公路公益性的破坏。倘若政府再对这种行为的放任，或无视民众对公路公益性的期待，就是管理上的失职。政府在管理上的失职，必然导致一些利益集团把公共利益企业化、部门化、私人化，像绕城高速这样的公共服务也必然变成一些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杭州绕城高速实质上已发挥着“城区快速道”的功能，免费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作为杭州市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绕城高速既是杭州进出宁波、上海、杭宁的快速通道，也使杭州形成“多点进城”的重要节点。同时，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还有利于杭州中心城市与经济次中心的组合，增强了与长三角城市的联系，从而带动杭州房地产业、旅游业等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所以，期待各方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杭州绕城高速免费通行，以缓解城区交通压力，让市民从中受益。

高速免费大餐，下咽有点难

■王国荣

即将迎来长假高速免费通行的第三个年头，不过春节免费通行尚属第二个年头。吃过几次“天下第一堵”的苦头，该是长记性了，然而具有独特劣根性的国人，总是对“免费”情有独衷，总是吃苦不记苦。

这种苦头，也许只有特别能吃苦的中国人吃得起。试想，堵上十几小时动弹不得，有在这“高速停车场”打牌的，练操的，逗娃遛狗的，还有担忧能不能吃喝上高于原价几倍的方便面和水，严冬开空调油够不够，甚至可能躲车内“睡死”过去了（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猝死），救护车过不来，直升机没这待遇……这堵车就不仅仅是吃苦头，而是变为十分恐怖了。

本来，推出免费政策的初衷或者说主因，是为高速畅通为治堵，同时也让利于民。因为，每到节假日，旅行、探亲进入高峰期，高速公路收费站如同一个个“动脉瘤”，导致通行不畅。所以，2012年7月24日国务院下发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制定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说：“为进一步提升收费公路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方便群众快捷出行”，实行免费政策。但是，免费新政实施，打通收费站“经络”后，全国仍有16个省市的24条高速公路出现大拥堵，尽管之前几乎所有人都预料到会出现出行高峰，但其来势之凶猛，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按说经历了首个国庆长假高速免费之痛，该在前车之鉴下有所收敛，能吃苦记苦、痛定思痛了。然而，国人对阵痛的淡忘极快，到第二个年头，2013年的春节，高速公路车流仍呈现井喷状，“堵”不堪言。像我省，虽然除夕前迎来龙年最后一场大雪，但仍没法止住回家过年的车潮，反而加快了人们回家的步伐，返乡大潮提前两天上演，无论是自驾车还是客运发送旅客数，均达到了春运以来的最高值，加之雪路引起交通事故频发，高速越发堵成了“龟速”。

“堵”，仍成为免费第二个年头国庆长假的主题词。据当时报道，我省高速比上一年国庆首日流量增两成，创历史新高。杭金衢高速长龙绵延数十公里，其中衢州段车流甚至绵延30公里外……打着如意算盘，想几个小时回乡吃上中秋团圆饭、国庆团聚的许多在杭人员，却是饿着肚子困在了路上。

明知路会堵，偏往堵路行，只因“免费午餐”太诱人，想省下买路钱的工薪族、低收入人群太多。一位京城做司机的朋友算过一笔账：他的老家在广州，从北京自驾到广州，高速通行费单程要上千元，而T字头的列车硬卧票也仅每张450元，相比之下自驾车要昂贵得多。也有人算账：小车收费标准0.6元/公里，而每公里的油费在0.8元左右，通行费不收了，节约效应明显，有车族纷纷选择自驾车甚至租车出行。实惠与速度，对于节假日自驾车出行的人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利好。因为以往假期，铁路一票难求，航空运输和普通公路也饱和，而高速公路除了收费站“添堵”外，整个车道的利用率并不饱和，“高价”把很多车拦在了外面。可是，新政实施后，众人都去争食免费餐，连一些新手也仓促上路，造成多起碰擦、追尾等轻微小事故，加剧了高速公路的拥堵。车潮加车祸，更把高速堵得喘不过气来。

尽管设想很好：原先一辆小车通过收费站交卡、缴费约需16秒（也有更长的），而只交卡不收费，快的话两三秒就过去了，后来连发卡收卡也被叫停了，直接通行，总以为这样整个大动脉都将快起来。哪里晓得，反而变成了几十公里的大“堵场”。于是，有人发现，因通行效率低而多花的汽油钱加上时间，远远超过了省下的买路钱。

本想省钱省时，可现实却非常残酷无情，让你堵在路上尝尝这免费是啥滋味。有人说，新政初衷虽好，但这免费的“民生大餐”，却被如潮车流闹成了一锅“夹生饭”，让人卡在喉咙难以下咽。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速长假免费，仍需免费享受者付出代价，有的甚至付出了永远吃不上回家饭的代价。

即将到来的春节长假，仍有7天免费大餐等着自驾行一族去争食，能吃苦记苦不再去扎堆凑这个热闹吗？笔者对此并不乐观，因为免费大餐太诱人。就是施舍一碗腊八粥，也有百姓不顾严寒漏夜排队。

公路，本该姓“公”的，但却要留下买路钱。而高速公路收费之高，一收就是几十年，还无赖般地超期收费，皆因它是一台无形印钞机，早成一大社会诟病。居然有“砖家”出来呼吁民众“错峰”出行，难道不知道就这么可怜的几天长假么？能天天国庆日日春节么？民众对改革期望多多，但结果，仅假日改革，假日办又让人吃了一次空心汤团。国人连想多休几日国定假都不能如愿，更别奢望全民落实带薪休假了。同样，也莫做高速公路让利于民的梦，现在仅有的几顿免费午餐，实在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好比给伢儿一颗糖吃。

五水共治，弹好协奏曲

■ 童颖骏

刚刚过去的2013年，正当浙江全力以治水促产业转型之际，国庆长假的一场强降雨，让宁波、嘉兴等多地遭遇大水漫城、多日不退的窘境。客观上，固然是因为短时间内雨量特大，几十年一遇；而主观上，城市化的步伐太快，自然水系遭人为破坏，大干快上的焦躁取代了科学规划的淡定，却是难逃其咎。

因而，在新年来临之际，看到浙江省委、省政府将“五水共治”作为深化改革、促进转型、推动升级的突破口，于百姓而言，着实是一件幸事。

江南水乡对水的尴尬，这些年来，我们体会太深了，已成切肤之痛。儿时在门前屋后游泳、戏水的快乐记忆，映衬出如今人们对于“牛奶河”、“黑臭河”、“垃圾河”的愤懑与无奈。让人尤为难以理解的是，省城杭州几次陷于“自来水有异味却查无原因”的困境，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水，作为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和公共性的社会资源的重要性，倍加凸显。

“五水共治，治污先行，与此同时，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也要齐抓共治、协调推进。”命题宏大，细分课题诸多，如何真正落实，也成为百姓关注之焦点。

然而，盘点刚刚过去之年的治水实践，急于求成的功利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依然有所显露，且有可能给未来的“五水共治”带来诸多隐忧。

开展治水攻坚战以来，各地纷纷出现了“河长制”，县市区、乡镇一把手挂帅，担任主要流域河段的“河长”，参与电视问政，局面相当喜人。但是要防“一把手至上的长官意志”。治水是系统工程，负责治水的官员，既要勇担责任，扎实干事，更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与气度。笔者了解到，新年伊始，各地为了响应省里“五水共治”的号召，急着上水利项目，争着要上级的配套资金，有的乡镇甚至忽略正常的招投标程序直接上项目，让人不免担忧会否“上了项目，下了干部”。

况且水是流动的，水质的好坏，也非一个流域一个时段的清浊与否能够决定。显然，“五水共治”要统筹兼顾、稳步推进，需要我们用更完善的机制来取代“人治”，如建立明确的激励机制、惩戒机制、要素保障和廉政监督机制等，才能把治水这一磅礴宏大的协奏曲弹好、奏响。

此外，莱茵河的治理故事，或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1986年，桑多兹化学工厂发生爆炸，导致莱茵河上一场灾难性的水污染事故。随后，瑞士和巴塞尔市修改了环境立法，授予政府当局检查设施安全和要求采取降低风险措施的权力。大型危险性贮存设施被防火墙分隔成多个小型设施，还建设了消防水滞流池，作为敏感性工厂的必备设施。通过合理规划、严格执法，落实了众多环境和水质保护措施。如今巴塞尔周边的莱茵河地区已成为欧洲最清洁的地表水体之一，莱茵河里的动物群也已恢复，共有63个鱼类物种，接近工业化前的水平。事实证明，如果处理得当，工业与环境可以和谐共荣。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治水固然任务紧迫，但科学规划，建章立制，依法行事，民众参与，多方监督，一件都不能少。

凤凰之殇

陈宇峰

凤凰古城，在当代文学巨匠沈从文笔下描绘得如诗如画、如梦如歌的故土情怀，足以勾起当代人的无限向往。去年初的门票事件则把这座古城再度推向了公众的视野，引起大众的强烈反弹。关注的热度不仅来自于涨价之后的官商间矛盾激化，而且还在于政府部门在处理这些公众事件时表现出来的过度自信和傲慢态度。

对于有无权力涨价，涨价之后的经济效应与如何补偿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一些非常严肃的经济学问题。不妨先讲政府对旅游门票能不能涨价的问题。类似于大多数的公园一样，这些旅游景区提供的服务也是一种准公共品，其具有鲜明的公共资源属性。旅游景点的开发，一方面在于提供一些休闲服务，另一方面的根本意义则在于传承历史或者自然文化。遗憾的是，当前无论是对政府还是民众来说，都已经渐渐淡忘这一公共属性。

尽管我们也反对高速公路在节假日的完全免费，导致节假日的交通堵塞，但此类旅游地的收费也不能太高，太高的票价可能会失去了文化遗产的意义。更何况是当前148元的高票价，足可引发政府对这种独占性公共资源垄断的抗拒和反弹。对于那些乐于涨价的地方政府，他们提出的理由无非就是成本的提高，或者国际的收费标准。但在这一点上，政府的这些根据是毫无理由的，因为国外对于公园和自然景观基本是不收费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文景观也只是象征性的收费。与其如此辩解，但不如直接说是地方财政的困境所在。试想一下，对于偏远的湘西之地，缺乏必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不依靠这块旅游宝地，怎能保证其地方财政的需要呢？

拿杭州与湘西作比，杭州因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厚实文化积淀的历史文化，是目前国内假期游客的三大聚集地之一。但如果因西湖申遗成功政府宣布凡是进入杭州城的游客，都要收取148元的进场费。很显然的是，政府手中拥有了一个看似比较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了。但可以想象，纵然西湖有天堂美景，到杭州的游客立即减少一半以上，这些年发展的餐饮住宿也就马上萎缩，那么地方政府的税收也就大大缩水。殊不知刚从门票中获取的收入，却又通过缩水的税基流失得更多。而这还仅仅只是一个静态的推断。更长期地看，没了这些生意，也就没了那些投资者和打工仔，大量的资本、劳动力和人才都流出城外。到时即使拥有十般之美的西湖，唱的只能是一计

空城而已。

过了一阵子，城内的民众自然也很快反应过来了。把自家门口的风景无偿给政府占用收费也就算了，问题是今后的出入变成了麻烦之事。当然，也有当地居民会钻此漏洞，成为一份职业。我曾去过一趟西塘，刚下车就被车站门口的那些黄包车团团围住，紧紧粘住，最后的代价是虽免去了高昂门票但失去更多的银子。自此之后，打定了再也不去西塘之类的古镇景点。回来之后，才发现身边像我这样的游客绝对不在少数。尽管本人还没去过凤凰古城，但我估计去了之后的经历也会和西塘经历不相上下，这样的格局根本无法吸引游客再度回头。

从杭州蒸蒸日上的旅游业和凤凰而今门口罗雀的惨淡经营对比，不难发现以上这些推断的合理性：得到的那点门票收入远远不如流失的税收收入。关键的问题则在于，这个连那些商贩都明白的经济学道理，当地政府为何偏偏不能明白其中奥秘呢？是真不懂，还是假装不懂，这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一旦出现惨淡场面，该由谁来负责？又该由谁来监督政府的肆意侵占公共资源行为呢？可能正是这些缺位的监督机制和责任，使得那些盲目自大的地方长官们竭泽而渔、为所欲为地侵占公共资源的根本原因。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教授）

越重科技进步

越该求真务实

■ 邓海建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10日上午在京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习近平向获得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存浩，中科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程开甲颁发奖励证书。（1月11日《检察日报》）

科技是人类进步的灵魂。无论是产业革命的号角，还是寻常生活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力量，在时间的光影里，总有点石成金的神奇。中国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近年已成顶层设计中的“例牌菜”，隆重而热烈，其传达的制度初衷，仍是科技的扛鼎之位。在去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国家颁布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不久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说到底，关注并重视科技的力量，是中国梦的题中之义。

越重科技进步，越该求真务实。

真实是科学技术的生命。契科夫说，“科学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最美好和最需要的东西”；亚当斯密说，“科学是对狂热和狂言的最好解毒剂”。美好也罢，解毒也好，立足点仍是科技基于尊重自然与社会的基础上，遵循客观规律，服务于有节制的人类需求。离开真实，科技就成了杂耍或魔术，甚至沦为逐利自肥的伎俩与诉求。尽管国家科技奖励大会让人振奋鼓舞，但这些年在科技领域中上演的各种乱象仍可谓惊心怵目。

这几天，凭借所宣称的国内几乎独一无二的人工耳蜗技术，指望在2014年通过这个项目实现高利润的海南海药，因控股子公司上海力声特的人工耳蜗意外卷入院士“造假门”而遭遇罕见跌停。此间牵引出的“至少57篇论文涉嫌抄袭、克隆国外人工耳蜗样机冒充自主研发、并以人工耳蜗项目一年内获得4000万元的国家级项目经费”等细节，以及院士成了“造假老板”之悬疑，依然未有权威定论。再往前，2013年，“张曙光2300万元贿选院士”一案惊呆无数国人，随后，科技部部长万钢又披露两期科研经费腐败的“恶性事件”。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中祥说得更直接，“应该让‘科技大亨’们公开一下他们的科研经费投入产出比。不要花一千元钱，买了一只普通的鸡蛋（只值块把钱）。 ”凡此种种，令人愤懑。

2012年，国家财政的科学技术支出为5600.1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45%。中国科研缺米缺盐的日子，正在财政的实力支撑中得以改观。有钱了、有地位了，科学技术的生产与研究，更要对得起国家财政及民意的期待。眼下而言，起码还有三个层面亟待刮骨疗伤：一是学术自律机制，将造假、贩假者从诸多潜规则中赶出来，晾晒在公共监督的阳光之下；二是科研分配机制，发钱的要管管花钱的，加大审计监管力度，禁绝“项目老板”等不正之风；三是反腐制衡机制，不怕东窗事发，就怕漏网之鱼，加大惩戒与究责力度，让科技腐败无所遁形。

科技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惠及民生的保障。眼下而言，中国在科技进步的路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依然任重而道远。

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政协协商

民主制度化的几个问题

■刘学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必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遵循三中全会精神，深入研究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若干深层次问题，对于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分必要。

一、关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新的历史起点

现代化应该是我们准确把握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新历史起点的核心词。

发展中国家后发现代化类型，是我们准确把握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新历史起点的关节点。发展中国家后发现代化类型，是主要依靠精英集团引领的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能够迅速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会引发短时期内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式爆发。我国现代化进程正处于中央权威的保持、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问题同时涌现的状态。这一状态对于身处其中的精英集团来说，如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普遍性的压力。当前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和各界社会精英，也正面临这样的压力。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中期发展阶段，是我国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新的历史起点。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教训，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对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早期阶段往往通过比较集中甚至集权的模式来推进现代化进程。这种模式虽然解决了这一时期后发现代化国家亟需的政府权威问题，一定程度地保证了这些国家社会利益配置方面的秩序性，也不乏发展的效率，却因缺失了政治现代化最主要的内在要求——民主和法治，所以导致权力制约的相对乏力，产生了一系列显失公平的社会弊端。当这些国家进入现代化中期阶段时，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原有执政集团面临能否继续在自己的领导下，在保持适度权威以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由过去集中集权模式向民主法治模式转型的问题。我国现代化进程已经整体进入现代化中期阶段，要有效吸纳这个阶段迅速增加的利益诉求，必须切实使整个制度体系进一步走向民主化、法治化。

二、关于新历史起点上人民政协的特殊属性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机构是各级人民政协组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必须明确人民政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属性。

目前关于人民政协属性的定位，主要体现在政协章程的三个表述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这三个表述对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曾经

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该对这三个表述做进一步的理解。比如可否明确人民政协的国家机关属性，是国家的协商民主机关，是我国人民行使协商民主权利的重要机构？我认为，这是有效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以人民政协重要职能之一的民主监督为例。1982年11月，刘澜涛在五届全国政协五次会议上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明确提到：人民政协的监督不同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没有法律约束力，是一种民主监督。2005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间的监督明确表述为“政治监督”，200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也表述为是一种“政治监督”。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民主监督”，属性是“民主”的和“政治”的，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没有法律约束力。

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作为这一制度的重要机构或平台，再笼统地讲它的监督职能“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没有法律约束力”，明显不够了，与这个制度机构或平台已经有的地位不相称。应该对这种“民主”和“政治”属性的蕴意作更深层面的理解。理论上，“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意味着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项“国家的”“政治”制度，而这样的制度应该是国家公共权力配置各方利益的机构设置、运行规则和程序等的总称，它不能不具有国家公共权力的属性。实践上，我们也习惯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统称之为“四大机构”，四大机构的领导班子称之为“四套班子”。因此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民主”、“政治”属性，也就不能不具有国家公共权力的内涵，否则在逻辑上说不通。

显然，对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属性的再审视，必然是与人民政协属性的再审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关于新历史起点上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法律保障

社会主义民主不仅要制度化，而且还要法律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并一直强调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也必须依靠法律化来保证。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强调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可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重要机构的人民政协，其制度设置、运行规则和程序等，目前还主要靠政协章程、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的报告以及有关决定和意见（或中共重要领导人的讲话）来规范。在宪法具体条文中，关于该制度主要载体和机构的人民政协则一条也没有涉及，更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显然与该制度及其机构或平台面临的新历史起点的要求不相称。

历史上，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曾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后于1954年底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取代，原因是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其规章再称为“组织法”易与国家机关的组织法相混淆。有研究者认为，这在过去是合适的，但现在人民政协已不再是单纯的统一战线组织，其职能也扩展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工作也已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府的职能部门），所以仅靠政协章程不足以保证政协工作的有效实施，应该重新研究制定人民政协组织法，使人民政协真正成为我国民主政治体制的法定重要部分。

四、关于新历史起点上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文化建设

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引发的历次社会变革所做的管理制度和规则的调整，都需要与之相应的公民意识的支撑。制度的真正法律化“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除了建构必要的显性组织机构，通过有关法律保障这些机构协调运行外，还必须注意与此相适应的协商民主文化建设。

协商民主文化，就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对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

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进行平等、广泛协商这种特殊社会现象的情感、态度、取向等的总称。具体来看，至少包含着这样一些基本理念：一是平等，即每个协商参与者在协商中发表意见必须具有平等性，靠理性的陈述和说服；二是协商的目的为“公共性”，即协商各方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这是协商民主文化的关键要素。国家和社群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处于优先的地位，公民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社群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个体利益只有在社群公共事务的顺利开展中才能实现；三是协商决策的最终形成须由协商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意见或理由所决定；四是每一个参与者即便不同意决策的观点和理由，也都能够理解决策是如何达成以及达成的原因。

协商民主文化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隐性结构，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已经充分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过程中，除了要完善各种政治制度和体制，同时必须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等，都是这种关注的充分体现。我们必须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协商民主文化建设。

深度思考 视点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

总体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柴宝勇在《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3年第四期撰文指出：在有些地方政协协商民主搞得不好，取决于两个方面（党委、政府）、三个人物（党委书记、行政首长、政协主席）。有人说政协工作能否有效开展，主要依靠书记重视、主席余威（大部分政协主席是从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的）。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法治化的缺失。从理论上讲，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总体存在着协商渠道不畅、协商机会失衡、协商主体地位不够平等、协商程序不够规范、协商民主机制不够完善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因此，从长远而言，必须把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列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总体布局，搞好顶层设计，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并使其与其他制度相衔接。

直面中小城镇气象灾害

郭树人在2013年8月28日《北京日报》撰文指出：近些年，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中小城镇的数量迅速增加，而中小城镇气象致灾问题也日益突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情况令人印象深刻。

造成中小城镇气象致灾严重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建设规划粗糙，布局不合理，给城市安全带来隐患；二是中小城镇气象监测预警能力不足；三是基础、防御设施简陋，造成中小城镇受灾严重。在进行城镇化规划过程中，需充分参考气象部门提供的气象评估意见，应考虑到所有可能的极端天气事件对城市的冲击和影响，避免在不宜城镇化区域进行城镇化建设，并根据气象评估完善城镇基础建设标准。对于那些已经建成的中小城镇，应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要加强城镇化特殊性气象服务及研究，提高中小城镇灾害预警预报能力。

文化发展要抛弃管制思维

蒯大申在2013年8月19日《文汇报》撰文指出：从文化发展的要求来看，文化自有其客观发展规律，任何对文化的管理都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是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那么，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要有处理好政府与文化市场及各类文化主体的关系，要更加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来看，少一点管制思维，多一点服务意识，是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整个社会在转型，党

和政府管理文化的方式也要随之转型，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抛弃管制思维，并不是说就不需要管理了，而是对政府文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抛弃管制思维，必须树立法治思维。一个公开透明的法制环境，是文化活动、文化创造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文化企事业单位必须依法办事，政府管理文化活动也必须依法办事，这样才能使文化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只有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文化发展才有可能获得可靠的制度保障，管制思维也才会越来越没有市场。

新媒体给法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张立伟在2013年10月28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正在为我们这个时代打下越来越深的烙印。新媒体的发展给法治带来的更大的动力，更大的可能性，更加完善的法律运作方式。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新媒体改变了人与人交往的方式，正在重新塑造着人们的观念、精神和价值；新媒体重新构建和扩展了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新媒体改变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往方式；新媒体也改变着法律的运作方式，改造着法律的固有局限，法律变得更加公开透明。这些变化为法律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提供了新的机会，也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法治更加巩固。

新媒体的发展也给法治带来了挑战。一个方面的法律挑战源自新媒体的新；另一个方面的法律挑战源自于新媒体的力量。新媒体的便捷性、广泛性、即时性、交互性等特点，使得它具备了信息传播的强大力量。政府要根据新媒体技术的特点和需求，探索建立法治为基础的新媒体管理模式。通过法治的方式，保障人民群众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实现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时，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

力与美的艺术使者

记市政协委员、香港国际美术学院院长 徐熾婷

■ 傅一览

这次来杭州的时候，徐熾婷在西湖边的过街地道摔了一跤。

“正好是一个斜坡面，米色的地砖很难注意到，我是有过武术底子的，但手也摔肿了，如果年纪大的人在这里摔倒，就会比较危险。”

徐熾婷回到宾馆简单处理了下伤口，又一个人跑到这个地道，在旁边仔细观察，询问附近的保安，在这个地方行人是不是很容易被绊倒。

这个小小的细节，是她对杭州的特殊情怀，也是她为人处事的态度。

作为香港美术学院院长，多年的绘画生涯，她身上带有艺术家的独特气质。

然而，她却实实在在是个社会人，是个奔波于纷繁事务与抽象艺术之间的使者。从2002年起，徐熾婷担任了三届市政协港澳委员，虽然身处异地，但她对这个城市，有着自己独特的视野。

她的一位老师曾经形容：力与美的结合。

—

徐熾婷的声音很温柔，她读简历时犹如读她人生的导语，从中你可以看到她生命的节奏。

出生于北京的徐熾婷家里世代习武。她六岁即被送到武术队，少林拳、刀、剑、枪、棒，无不精通。

父亲希望徐熾婷长大成为医生，但是她却在少年宫里迷上了绘画，并偷偷拜师学习。此后的人生，与画结缘——1984年，她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1986年，赴法国巴黎国家高等美术学院深造；1997年，被载入《世界名人录》；1998年，荣获美国肯尼迪大学哲学、教育学博士学位；2003年，被美国百圣皇家学院授予文学荣誉博士名衔。在求学生涯中，徐熾婷曾获得了美国、英国三所知名大学的教育学、哲学和文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九年澳门回归时，徐熾婷的作品获得了中国文化部举办的全国艺术大展银奖。如今她已在美国和香港的好几所艺术学府里拥有了自己的一席

之地。

现在的徐熾婷，是香港国际美术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校董、西安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

徐熾婷喜欢画花，喜欢画自己的眼中的美好世界，创作过程中，她秉承艺术无国界的理念，把国画与油画融会贯通，将绘画中的中西方元素结合得淋漓尽致。

关于她，有许多传奇的故事。

在香港的时候，徐熾婷有次遇到一个开大卡车的司机企图调戏她，并用大卡车撞坏了她的车。忍无可忍的徐熾婷下车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拳法把那膀大腰圆的司机打得无还手之力，然后打电话报警。警察看到满面开花的壮汉司机不肯相信是眼前这个弱女子所为。

在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八十岁生日的前夕收到了徐熾婷赠送的生日礼物——一幅她自己创作的环保题材作品。这幅以油画手法创作的国画花团锦簇，让老布什获得了意外欣喜。

许多人评价她，对人生关切的画家多不胜数，只是徐熾婷找到了属于她的西方色彩和东方的情愫，还有她与花的私语。

“我的作品倡导和平和环保，我希望更多的人从我的画中吸收到这种信息，就好像我把每一株小花和小草都画得像生命一样很茂盛，因为它们都是一个生命的载体。我们要去爱护它，像爱护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

谈到自己，徐熾婷说，一切追随心的感觉，这是人生的态度。有这样的态度，遇到任何困难，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克服。

二

徐熾婷似乎有无穷的精力，在武术与艺术之外，她还想追求更多。

她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赴法国留学期间，曾受聘于巴林银行。一九八七年从法国移民到香港后，徐熾婷创办了自己的贸易公司，从事医疗、建筑等领域的业务经营，先后为北京饭店、新世纪饭店和上海东方商厦等知名大厦提供专业工程服务。回国后，她在北京创办了中国东方艺苑，从事艺术品市场经营。

她将投资领域拓展至金融、房地产等行业。2003年，应香港著名高科技公司“T. A.”的邀请，徐熾婷出任盈达电子商务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在其领导下，公司在中国内地拓展了市场运营，为中国银行、中国旅行社总社等国内大型企业提供了电子交易平台。

她又是一名成功的校长，她努力让学生掌握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使中华文化的根深深扎根于心中，又致力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将国外优秀的理念和技巧介绍进来，让学生能站在艺术的最高视点。在她的努力下，2004年，她以香港国际美术学院院长身份在中美教育合作项目签字仪式上与纽约大学校长签署了合作协议，在促进对外交流上做出了贡献。

徐熾婷忙，但她会分出许多时间，用来做善事。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徐熾婷每年的花销中都有一笔专门用于抚养孤儿的费用。1993年，徐熾婷到桂林旅游，路边流浪儿无依无靠的生活，深深触动了她。于是，通过当地文华酒店工会，徐熾婷领养了20多个孤儿。10多年来，她每个月为每个孩子拿出五百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华东地区水灾、文化扶贫、地震等慈善捐赠簿上都有徐熾婷的名字。

2000年3月24日她在香港慈善酒会上，将自己的一幅油画作品《盛放的向日葵》参与慈善拍卖，并将所得的48.5万港币全数捐出。

“其实我一直不太喜欢慈善这个词语，我认为这是一种分享，当我为别人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也得到了快乐。1996年我曾经到斯里兰卡去捐赠一所图书馆，当时随身有2万美金准备同时捐助购买书籍，那天天气太热了，我把钱随手放在宾馆房间就去游泳了，游了一半才想起来。跑回去一看，东西一点没少。那个地方进出有不少人，当地人并不富裕，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我感到的人性美。在那里住的一段时间，我常会去孤儿院看看孩子们，当他们围过去，伸出手抱住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温暖的爱，灵魂得到了洗涤。”

徐熾婷说，这是她选择的生活方式，并满足于享受这个过程。

三

担任政协委员10多年，徐熾婷几乎年年有提案和建议。

呼吁引进香港专业服务联盟、推进杭州中介服务业发展；呼吁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进一步重视文化建设；建议杭州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呼吁加强对个人信息保护；高层大厦的物业管理……每一个提案，都与这座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

政协的工作人员曾经用一句话评价她——用政协委员的眼光关注杭州的建设，用政协委员的责任关注杭州的发展，认真通过提案、建议等形式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在2005年市政协八届四次全会上，她领衔与香港华兴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陈伯滔，香港宁基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墨宁，加拿大赛克进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梁道林，美国壮景公司总裁、美国中国商会副会长陈景东等委员一起，联袂提交了《关于加强杭州大剧院软硬件建设的建议》提案。

“杭州是文化名城，但现在这种文化基本上是依靠自然秉赋。杭州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名城，还需要有高雅经典文化活动的载体，而大剧院就是一个重要载体。”

徐熾婷说，当时，来到杭州的时候，发现杭州大剧院在硬件上与上海大剧院和新落成的浦东东方艺术中心相比还有差距。

特别在舞台背景设计、剧场地面的感觉、大厅导风和避风屏障的处理等硬件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在软件上缺乏精心的护理，等等。为此，提出了在硬件上与上海大剧院错位互补；在剧种上定位成为某一剧种或某几个剧种的专用剧院并实施专业化的功能改造；设计富有创意的杭州大剧院特有的logo；大力改善剧院的管理；用心集聚尽可能多的文化人落户杭州；设计一批和大剧院相关的衍生产品等建议。

她的提案引起了钱江新城指挥部的高度重视。收到建议后，指挥部立即会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单位对建议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专题研究，并进行了认真答复。如今的杭州大剧院，歌剧院、音乐厅、多功能厅，舞台机械设备、音响系统一流，大厅艺术装饰和陈列展览，显得剧院更具有艺术气息。成为杭州人欣赏高雅艺术的好去处，艺术家展示才华的大舞台。

2012年，她撰写《关于加强高层建筑消防的提案》，建议以上海、香港曾经发生过的重大火灾为前车之鉴，充实本市的高层防火、救火的预案，防患于未然，她的提案获得了优秀提案奖。

对话委员

记者：你平时工作很忙，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

徐熾婷：我是一个很自在的人，平时不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但每一件工作，我都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个今天。工作的时候，我更注重选择好的方法，一定会把复杂的工作简单化，简单的工作条理化。做任何事情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方法错误再多努力效果可能也不如人意。我平时工作很忙，当然会有很累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懒必堕、堕必落、天道酬勤，多读几遍让坚持下去。

就像我经商和从事艺术行业，前者是一个生存的渠道，我需要带着企业一起发展，所以我做事情的时候会非常理性。后者对来说是一种自我修养的提高，画画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是非常感性的。

记者：怎么看待杭州这座城市？

徐熾婷：首先我非常喜欢杭州，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曾经在中国美院学习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是我人生中非常意义的一段生活。我在中山路中大广场附近租了一个画室，除了去学校上课之外，一有空就去西湖边画画。每一次，我都是很早就起床，有时候是赶到植物园去画睡莲，去的次数太多了，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跟我很熟悉了，我们还会一起吃小馄饨。有时候就雇上一艘手划船，摇摇晃晃到了湖心，在船上画画一直画到天黑，晚饭也是船老大帮我带的。在那段时间，我几乎和外界没有其他接触，专心学习、专心画画，内心非常平静，这是非常难忘的一段美丽时光。后来，我在太庙展出了这批作品。所以，能成为杭州的政协委员，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份工作，我

愿意尽我所能，哪怕能起到一点点作用，也能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美好。

记者：如何充实自己，遇到挫折怎么处理？

徐嫵婷：学习，永远不要停止学习。我很感恩自己遇到的挫折和困难。打一个比方吧，同样的石头，被雕成佛像或工艺品以后，人们会顶礼膜拜、会尊重这件艺术品。但是，对那些没有被雕琢的原石，人们可能就随意丢弃或是踩在脚下。道理很简单，经过雕琢的石头经受过磨难，有过一段不寻常的过去。人也是一样，挫折和困难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把你从原石变成艺术品的必经之路。我是一个佛教徒，相信这样一句话：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打造中国最优秀 的服务外包公司 ——记市政协委员、浙江大 运盈通信息服务外包有限公 司董事长赵海燕

■ 汤媛媛

打开浙江大运盈通信息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的网页，“立志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离岸呼叫中心服务外包上市公司；成为华东地区乃至世界呼叫中心产业最佳承载基地；成为国内现代服务业的标杆示范基地和全国呼叫中心人才培训与派遣基地”几行大字在页面滚动，一个新锐前沿、高调开放的公司形象跃然眼前。

令人意外的是，作为浙江大运盈通信息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的掌舵者，董事长赵海燕给人的第一印象却是低调谦和，不事张扬。“赵总个人意志坚强坚韧，能冷静处理企业发展中的起伏波动，擅长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指导思想领导团队完成既定目标，为公司股东、员工创造利润，为社会谋福祉。”这是熟悉他的同事，对他的评价。

明晰目标，挑战自我

与赵海燕交谈，可以感觉他是一个目标明确，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为之而努力的人。

正是由此，他早年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顺风顺水，事业达到高峰时能够激流勇退，以“归零的心态”进入浙江大学读书充电。“在那里做到顶了。”赵海燕明白，自己的人生价值不在那儿。经过浙大读书生涯的再充电和思考，37岁的赵海燕为自己规划了另一个人生轨道：创业，方向是服务外包这个新兴产业。

当时，服务外包在我国刚刚兴起，市场潜力巨大。

2004年，大运盈通（北京）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旨在运营无线数据通信业务新锐项目。由于目光前瞻，定位准确，赵海燕如鱼得水，仅仅5年，公司即荣登2009年中关村TOP100成长榜。此时，赵海燕再次做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回杭州发展。“杭州的发展机遇也许不如北京，但是父母在杭州，家人在杭州。”而且杭州是2009年国务院确定的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虽然能源资源匮乏、环境容量有限，但是自然条件优越、人力资源丰富，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符合杭州的城市特质。

经过权衡，赵海燕毅然回归杭州。2011年，在整合BPO服务外包各方资源的前提下，赵海燕在浙江海创园成立了浙江大运盈通数据信息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信息服务外包呼入呼出业务、人才派遣与培训和数据处理（录入）等。

赵海燕介绍，呼叫中心和传统意义上的寻呼台完全是两个概念。它是利用互联网和现代通信等技术，自动灵活地处理大量不同电话呼入和呼出的运营操作场所。对企业来说，呼叫中心是电话营销和客户服务的手段，对消费者来说，则是一个客户服务、产品咨询的平台。

“举个例子，浙江有很多中小型企业，还有很多浙商把生意做遍了全球各地。他们有很多售后服

务、客户服务、电话营销、市场调查等需求，如果自己建立一个呼叫中心，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都太高、也缺乏相关经验。这时候，浙商就可以把业务外包给大运盈通，由大运盈通帮他们搞定全球各地的业务。”

专业而先进的理念，让公司发展迅速。目前，大运盈通信息服务呼叫中心产业基地——绿色声谷，有500个坐席，已投入800万用于装修及软硬件平台的研发，是浙江省装修、服务最高端的服务外包基地。据悉，一个席位可以带动上下游配套服务企业10倍产值的产生，还有利于带动地区的就业，根据呼叫中心产业劳动密集型的特点，一个席位可平均为2.5人提供就业岗位。

知识创造价值

创业期间，赵海燕不断地进行着国际前沿知识的更新，创业创新理念的吸收。

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法国马赛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国际管理中心访问学者……一连串的求学经历，可以看出赵海燕对新知识新理念的不断汲取。而这，也让他的公司一直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公司要严格按照世界专业级呼叫中心服务外包公司的理念进行打造。”这是赵海燕的要求。2011年4月20日，在第三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呼叫中心专题研讨会上，大运盈通（杭州）呼叫中心有限公司与全球服务能力与绩效协会（Service, Capability and Performance, 简称SCP）共同签订了《SCP培训与认证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在全球顶级客户服务与技术支持执行标准的培训和认证上进行全方位合作打下了基础。

同时，公司还与来自美国犹他州的FOCUS SERVICES公司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借助FOCUS SERVICES公司17年的BPO服务外包行业的专业技术背景与运营管理经验，为大运盈通承接各行各业的外包业务提供可靠的技术、资源及运营管理支撑。

“大运盈通‘绿色声谷’将发挥国际服务外包的后发竞争优势，以呼叫中心为切入点，逐步发展成为国内外呼叫中心产业聚集和业务承载、业务流程外包（BPO）、呼叫中心人才与派遣、呼叫中心新产品试验的综合中心，可为国内外用户提供在岸与离岸外包呼叫中心服务。”

“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打造完整的呼叫中心服务外包产业链。打造世界级绿色呼叫中心基地，立足杭州、面向华东、连接世界。”

赵海燕的话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欧洲一名客户买了台电脑，打经销商的客服电话咨询，接通电话后，电话那边英语流利的客服人员，很可能就是位于中国杭州的大运盈通呼叫中心员工。

“目前，全球大部分500强企业将自己的电话营销、咨询及客服等服务，外包给了印度班加罗尔的呼叫中心，而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业务分流一部分到杭州来。”赵海燕说，目前公司正在和一些全球500强企业、中国百强企业接洽，承接他们在中国的呼叫中心业务。

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典型代表，2011年12月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赵海燕作了相关报道。

服务民生，解决就业

由于呼叫中心服务外包这一产业是新兴产业，赵海燕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广产业发展理念，努力改善呼叫中心服务外包的发展环境、人才培养。

在他的努力下，大运盈通与工信部商务部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和杭州市人民政府、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委员会共同举办了2010亚太地区呼叫中心产业峰会；作为轮值副主席单位与来自国内的呼叫中心领袖企业和权威专家共同发起组建2010中国服务外包呼叫中心产业论坛；牵头举办2011年呼叫中心与电子商务产业论坛。

这些峰会不仅提升了杭州市呼叫中心服务外包产业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大大推动了杭州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还吸引了工信部与商务部以及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稀缺的政府资源与国际上优秀的服务外包商来杭创业投资，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乃至亚太地区呼叫中心同行在交流中相互学习、加速成长、共谋发展。

作为北京邮电大学BPO专业技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赵海燕经常开展呼叫中心服务外包领域的各类专业培训，致力培养BPO服务外包行业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才，塑造通信与服务外包行业一流

的尖端人才，为中国的服务外包行业的大力发展提供优秀厚实的人力资源储备。

中国呼叫中心产业论坛协会副主席、中国通信协会增值业务专委会常委、工信部呼叫中心服务标准制定组成员、杭州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521”计划杭州市特聘专家……一系列头衔，是对赵海燕在业内的影响力与贡献的认可。

通过省委组织部专家组的综合评定，大运盈通的“绿色声谷”呼叫中心产业基地被评为浙江海创园重点项目，同时也是海创园内解决就业人数最多的企业之一。

“两年内形成4000坐席规模，5年内形成12000个坐席规模，成为亚太地区一流的呼叫中心服务外包企业。”赵海燕认为，作为企业家，将企业经营好，让员工快乐工作，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面对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赵海燕与杭州师范大学合作，在大运盈通建立呼叫中心实习基地，已先后吸引2万名学生来培训与实习，大大提升了应届生的就业率。

作为杭州市的政协委员，赵海燕积极参政议政，《关于扶持杭州“中小企业呼叫中心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议》、《关于扶持我市“离岸呼叫中心外包公共服务平台”发展的建议》等提案，为呼叫中心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摇旗呐喊，组织工信部的专家共同起草撰写的《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推进杭州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调研报告，在杭州市政协常委会议上提交，为杭州的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建言献策，不少建议得到采纳。

赵海燕一直乐于慈善事业，常年心系弱势群体，多次支持贫困山区教育，公司因此被授予“支援贫困山区助学帮困先进企业”荣誉称号。如2012年12月22日与杭州民进青工委以及浙江海创园共同举办贵州勺米乡鱼塘小学图书捐赠活动，现场捐赠踊跃，本活动受到主办方及媒体的一致好评。

“‘服务民生，解决就业’是大运盈通的企业战略理念，也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赵海燕说。

对话委员

为呼叫中心外包产业发展而呼

呼叫中心外包产业是现代服务业和服务外包产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无污染、微能耗、高就业、高倍增、高渗透力的独特优势，有助于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是国家鼓励发展的新兴产业。作为政协委员，赵海燕一直在为呼叫中心产业的发展而呼吁，而努力。

记者：呼叫中心外包这一产业，发展潜力如何？

赵海燕：我国呼叫中心外包市场近几年一直保持25%的增长速度，产业发展潜力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果，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直接导致了资源环境代价，包括人类身体健康的代价。与此相对应，呼叫中心外包产业是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呼叫中心是企业对外服务的窗口，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利的服务保障，是形成企业品牌，建立企业形象的坚实基础。呼叫中心具备双重角色，对外代表企业，向客户传递企业产品信息，提供产品的售前后服务。正是因为呼叫中心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整个呼叫中心行业发展快速。

记者：呼叫中心外包，对企业来说，有什么好处？

赵海燕：近年来，企业呼叫中心外包思想逐步深入人心，与其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自己做，不如包给专业的人做。对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讲，呼叫中心前期一次性成本投入比较大。同时，外包服务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包括场地、设备、人员、运营，企业只需要对结果问责就可以了。此外，呼叫中心对系统稳定性要求非常高，专业外包公司有专业的团队，有专业良好的维护。所以说，用户选择外包之后，可以避免大量自建成本，还有学习和运营的成本，可以说，呼叫中心外包是大势所趋。比如国内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旗下淘宝已经外包。

记者：市场潜力巨大，呼叫中心外包企业目前发展的困扰是什么？

赵海燕：呼叫中心基地具有人力资源密集型、技术资源密集型、知识结构密集型等特征，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带来众多经济、社会效益。当前首要的是人力资源的问题。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有六七百万，但我们很难从这中间找到专业对口的人员，说明整个中国高等专业教育设置还是远远滞后于我们的需求。目前有一些学校正在尝试开设呼叫外包专业，还有民营培训机构行动。

但是这些毕业生，对我们行业需求来讲，还是杯水车薪，彻底改变这个格局，还是期待我们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变革。

记者：对政府在政策扶持方面，有什么建议？

赵海燕：小微企业呼叫中心和政务类呼叫中心公共服务平台，是服务民生、解决就业、利国利民的新兴产业。建议政府部门将政府部门为民生服务的非核心的呼叫中心与数据录入服务，外包给政务类公共服务平台，一来可以降低政府办公成本，二来可促使呼叫中心平台更具专业化、效能化。同时，在企业人才引进方面给予配套政策，特别是住房的供给问题，以相对低的租金，租给引进的呼叫中心人才，解决人才安居问题，或在规划用地时直接考虑人才公寓配套用地。从教育规划上考虑，建议设立呼叫中心外包学院。根据全市呼叫中心发展情况，建议政府与大型呼叫中心产业基地或国际知名呼叫中心外包企业合作建立呼叫中心外包学院，为该行业提供专业人才输送。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气神”

■ 沈者寿

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身就是一种奋力进取、积极向上的“精气神”，而要实现中国梦，就更需要有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精气神”。

我们党历来重视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认为这是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时代不同了，时代在前进，处在经济全球化、资讯网络化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我们所说的党员干部的“精气神”，与过去比较就有明显的不同：

在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曾经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要让高山低头，要让河流让路”，还有什么“一天等于20年”、“15年超英，20年赶美”等等振奋人心的口号！那时候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可谓豪气万丈，牛气冲天了！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民意，不尊重法律的蛮干胡来的“精神振奋”，是注定会碰得头破血流，最终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的损失。

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今天，我们要求提升党员干部的“精气神”，是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前提下的“精气神”。这就要求我们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凡是市场和社会组织能解决的事，政府就不要去做，政府只做市场和社会组织做不了的事。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精气神”、“积极性”越高就越坏事。政府要敬畏市场的力量，管控好自己的权力边界，该放的权就要坚决彻底的放，真正还企业和老百姓创业的自由！

在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们强调提升党员干部的“精气神”，是在坚持科学精神、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前提下的“精气神”。那种为了一味追求GDP政绩，不讲科学态度，不讲可持续发展，不讲以人为本，不讲民主程序，不讲办事的成本和效益，任意拍板，盲目蛮干，这样的所谓“闯劲”、“大手笔”，绝非是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精气神”。

在积极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今天，我们强调提升党员干部的“精气神”，是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尊重人权、维护人民私有财产前提下的“精气神”。为了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如果在拆迁居民住宅、征用农民土地中不按法规办事、不走法定程序，搞强迫命令，严重侵犯人民群众的财产和权益，即使干劲再大，再卖力，作风再雷厉风行，那也绝不是我们所提倡的“精气神”！

一句话，我们所需要提倡的“精气神”，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精气神”，是坚持科学精神的“精气神”，是坚持法治精神的“精气神”！有了这样的“精气神”，才能确保我们走上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七届市政协副主席）

像是游戏：给全民发工资

■ 石久

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听到最有意思的消息是，瑞士即将公投“全民发工资”提案。如获通过，将给每位居民提供数额相当于17000元人民币的无条件固定月薪，籍此人人都可“过上朴素的生活”。瑞士有望成为全球首个给公民发工资的国家。

如果提案通过，工作将与谋生无关，而成为个人兴趣所在与发挥创造力、得到社会尊重的渠道，很接近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理想社会的表述。

我乐见其成。因为此种试验足以检验如今通行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也可能为人类走向明天展开一条新的道路。

被视为共产主义理论三大来源之一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四百多年前就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过类似设想，但即使上世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验中，也没人试行过这种做法。

这笔钱约占瑞士国内生产总值1/3。支持者宣称，此举是为了让社会变得更公平，改变瑞士收入不均的现状，也更能保证人民的自由，让瑞士公民可以选择做自己喜爱的事情。

提案发起者之一丹尼尔·特劳布表示，“现在已经到了将人力和工资脱钩的时候了，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机器生产能够代替大量人力的时代，我们应该庆幸。”

这当然是提案可能通过与实行的前提，即依靠高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瑞士成了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但即使提案得到通过，也不见得是“英特耐雄奈尔”的先声，因为瑞士只是一个小国，受惠者囿于本国居民，未必具有普遍推广的可能。

反对者担心因此造成瑞士人的工作倦怠，这当然基于常识与对人性习惯上的认知。但如果大多数瑞士人支持这项提案，他们不可能都是傻瓜。至于能不能用其后的行动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提案，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给全民发工资”只是近来瑞士若干遏制社会不公平的措施之一。此前，瑞士公民已投票同意了限制企业高管高收入的反“偷窃”提案。遥远异邦的此种做法，与如今中国政府在推动的公平发展与社会正义无疑具有一致与平行处。

杭高老同学华贻芳

■ 孙霆

我是1946秋进杭高的，小华是1947秋进杭高的，我比他年级高，但华贻芳这个名字我却在他进校不久就知道了。那时我正在读一本叫《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的书，作者华岗是我党早期的理论家，他的宏著深深吸引了我，给了我最初的启蒙教育。有一次张育珍偷偷告诉我，说华岗的儿子就在我们学校念书，这引起了极大的惊喜和好奇。暗中寻访，几经打听，终于得知他名叫华贻芳，是一位个子不高，长着一副娃娃脸，很惹人喜爱的同学。因为不是同年级，所以那时我与他并没有直接的接触。1948年我和小华先后参加了地下党，下半年开学不久，我和他以及张育珍三人编成一个党小组，成了定期秘密接头、生死与共的战友。有一次我们在张育珍家里秘密开会，会议的内容是悼念王孝和烈士。王孝和不久前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刑庭判处死刑，公开绑赴刑场枪决，一路上他高呼口号，慷慨就义，表现得非常英勇。王孝和牺牲后，上海局在党内公布了他的地下党员身份（王孝和为保守党的机密，至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号召全体地下党员向他学习，像他那样为党的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这次党小组会议上，我们的内心都非常激动，每个人都压低了声音庄严宣誓，表示了自己要像王孝和烈士那样革命到底、不惜牺牲的决心。我清楚地记得，那次会上还讨论了万一被捕后怎样应对的问题，甚至连坐老虎凳、上电刑都谈到了。这种同生死、共命运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我与小华在一个党小组共处的时间并不长，不久我们就分开了。

那时杭高地下党支部的工作分为三条战线，一是学生自治会和校方、教师的工作，二是班

级工作，三是社团工作。所有地下党员和Y.F.（新民主青年社）成员，首先要做好自己所在班级的工作，同时利用各种关系向其他班级“渗透”，发展进步力量。由于杭高社团数量众多，非常活跃，因此多数党员都分在社团里工作，通过多种多样的社团活动团结教育群众，壮大革命势力。小华当时就被分配到社团这条线，同在这条线工作的党员还有关志豪、张政、马梅初、徐国恒、朱人凤、叶世英、杨宣宁等。1948年下半年，我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的常务理事，主持理事会的日常工作，与王维澄、陈纲（他们二人此时都在毕业班，已退居二线）编为一个党小组，定期讨论自治会和校方、教师的工作。讨论后作出的决定，再由我公开出面，去具体组织实施。有一次，张政和小华都向我提起，说他们从浙大搞到一个《白毛女》剧本，打算公开演出。因事关重大，我将此事在党小组会上提出，经过研究一致同意演出，但认为《白毛女》这个剧名太“暴露”，要改（后改为《再生》），并要我同校长方豪联系，做好工作，以防生变。方豪迫于形势，并没有故意阻拦，但说演出只能限于校内，绝对不能闹到社会上去。以后《再生》的演出非常成功，不但在校内引起轰动，影响也波及校外，演出时许多兄弟学校的同学都闻讯赶来观看，方豪对此无可奈何。所谓“形势比人强”，此之谓也。

由于校内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影响不断扩大，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互相协调，我提议在自治会领导下成立“社团联谊会”。首次成立大会上推举戴纯崇（Y.F.成员）负责，小华也参与其事，并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如1948年冬欢送毕业同学晚会，为庆祝杭州解放而连续三天的文艺演出，小华虽然很少抛头露面，却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同学们的赞扬。在那些日子里，每逢遇事商讨，总会听到一些人“小华小华”地叫个不停。

杭州解放后，杭高地下党员和Y.F.成员除极少数外，都转到青干校去了。青干校第七中队学员基本上都是杭高的，起初由我担任中队长，小华担任副指导员。在筹备期间，我们朝夕相处，日夜忙碌。但开学不久，组织上就把我调到第五中队去当中队长了，说是“干部要互相交流，你们杭高的人不能总是搞在一起”。我虽然恋恋不舍，但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不久，青干校要挑选一批学员到中央团校学习，小华也被选上了。从此，我与他身处两地，相隔南北，加上政治运动不断，彼此间的联系就很少了。以后，听说他被派往捷克留学，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不久又听说他因受父亲的牵累，突然被调回国内“审查”；文革中又投入监狱，遭受了一场更大的灾难。这一切又使我感到震惊、痛心和困惑。此后便完全中断了音讯。虽然我曾心向着北方一次次地默默祝福，但是那个长着娃娃脸的小华，那个生龙活虎的小华，好像一下从人间消失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的一段日子里，乌云逐渐散去，好消息不断从全国各地传到杭州，天空似乎一下子晴朗了起来。当年出演白毛女的杨友梅，专门到我所在的单位里来看我，说起她这么多年来被流放到青海的遭遇，说起她的同班同学小华，禁不住感慨万千，唏嘘不已。不久，我看到小华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字写得很清秀，没有什么涂涂改改，却画了许多曲线，把新添加的话一句句勾到字里行间去。这封信主要不是叙述他多年来的遭遇，更没有抱怨和泄愤，而是倾诉了他对老同学老战友的一片深情，意蕴恳切，极大地引起了我的共鸣。

是上世纪70年代底还是80年代初，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我记得十分清楚的是，那年有一天的晚上，我家里突然来了一大帮子人，足足有十几位吧，为首的就是小华。小华是专程从北京赶到杭州，约了一批人到我家来相聚的，简直把我家里挤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一晚上，大家乱哄哄地你一句我一句，小华更是容光焕发，不时地插话。可惜因为人多，根本听不清谁说了些什么。但无可否认的是，大家的快乐情绪互相感染着，好像在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是啊是啊，黑夜尽头是光明，难怪每一个从阴影里走出来的人，都要尽情地放纵一番了。

小华回北京后不久，陆续给我寄来了一批他父亲华岗的遗著（手稿复印件），这些著作都是在监狱里写的，所以格外珍贵。我读了其中的哲学部分，每次读完抚卷深思，不但为作者的深厚学力所折服，更被他的顽强意志和人格魅力深深打动。一个蒙受冤屈、长期身陷囹圄的老前辈，仍坚持笔耕不止，写了这么多的理论著作，那该要有多大的精神力量支撑呀。他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深入阐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的《规律论》，对长期流行在党内的那种无视、否定客观规

律的主观唯心论，更是有力的批判和否定。当然，由于这些著作诞生的时代背景，加上监狱环境的闭塞，所以应该说它们仍属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并没有从中嗅到多少“离经叛道”的气息，可为什么就那么地不容于人呢。

90年代以后，小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回到杭州来。但他并非游山玩水，而是来办事的，所以每次都来去匆匆，我们虽然见了面，却没有机会作深入的交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与他在互联网上“见面”了，他不时地从网上给我发来许多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大开眼界，也使我明白了他正在思考一些什么问题。章诒和的《往事》成书之前，是他一篇篇从网上发给我的，我读后被深深地打动了，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我向他诉说了读后的感受，而他的回邮却是非常理性和冷静的。这说明他已经从最初的单纯感情圈子里跳出来，放大了视野，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了。他还给我寄来了《顾准文集》，书中深刻的思想引起了心灵的“地震”。有一次他告诉我《李慎之文集》出版了，问我要不要，但说定是要付钱的。我毫不犹豫地订了两套。他来杭州时，事先同我约好在城站出口处见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文集》分厚厚的上下两册，十六开，两套共四册，很沉，亏他大老远从北京带到了杭州。

小华晚年热心于民营企业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由此，他对这个“民”字也情有独钟，可以说是一种“民间情结”吧。而“民”的另一方是“官”，提起“官”，他总是带着某种审视的目光。对于官场的种种腐败现象，他疾恶如仇。对于官本位、官架子、官气官话官腔官调，他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有一次在青年学院举办的会议上，我听小华同班的一位发言，说他当年如何介绍了小华参加地下党，如何共同战斗等等，说得有声有色。我一听觉得不对劲，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小华入党是张育珍介绍的，怎么成了他的了？中午进餐时小华正好坐在我的旁边，我低声问他：“他怎么成了你的介绍人了？”小华说：“我自己的介绍人张育珍，我难道还不清楚吗？”又说，一个人当官当久了，思想是会慢慢变的，总喜欢把好事往自己身上揽。说罢，一边摇头，一边朝我莞尔一笑。

小华重病住院的消息我知道得比较晚了，还来不及问问详细情况，就传来了他不幸去世的噩耗。太突然了，令我大吃一惊。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的身体还是比较结实、健壮的，谁知在健壮的外表下，却深埋着隐患，正一点一点地侵蚀他的内脏。他年龄不算大，按常理应该活得更长、更久。可是小华确实是走了，我相信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所有的老同学、老战友都非常惋惜，非常怀念他，要为他编一本纪念文集，我当然无保留地赞成和支持。如果有天国的话，我衷心祝福我们的华贻芳同志在那边尽情地享受自由和快乐，“一船明月一帆风”，愿清风明月一直陪伴着他，遨游苍穹，直到永远。

孩子长大要像谁

■ 黄亚洲

几乎每天都路过那片食品店，也必定每次都进去都拉开冰柜抓一支巧克力冰淇淋，两美元九角九分，也就是合人民币十八块，贵是贵一点，味道好，谁叫美国人的奶油和巧克力都做得那么地道，不予掺假。

收银员是个少妇，柬埔寨人，会广东腔的华语，第一次看我指指点点张口结舌时就教了我一句英语：“我不会说英语。”这句话我后来在很多场合下都使用过，屡试不爽，老美每次都回以微笑和谅解的目光，外加一丝怜悯。

买冰淇淋次数多了，就攀谈起来，问我来美国干什么，我就说起我的外孙柬禾与外孙女雨禾，她于是也说起她的儿子，说两岁了，准备等儿子十岁时，把他带回柬埔寨去生活。我表示讶异，说你们既然在美国住下了，为什么还要回去，这里毕竟是现代生活，圣何塞就像个大花园，这么优越，难道柬埔寨比这里好。她摇摇头，说这里的孩子太独立了，大起来不听大人话，不会孝顺，十八岁以后要管也不能管他了，如果学坏了，好好一个儿子不就白生了？

后来我啃着冰淇淋走在不见一个行人的鲜花盛开的街上，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个柬埔寨女人的忧心

事，她真是说出了一個天大的問題，兒子白生還不是天大之事？尤其是我們東半球的人，視子孫為命根，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後代？動植物都如此，何況乎人？所以兒子白生的危險，肯定就高過一切，柬埔寨絕對比美國好了。

孩子在美國的地位據說比什麼地方都高，美國的家庭都是把孩子當朋友一樣對待的，或者說當大人一樣對待的，年紀很小的時候就“認真徵求對方意見”，不會勉強對方做什麼或者不做什么，不像我們這裡十八歲以後了還是家長口令式管理。

那天在家門口的兒童遊戲場上，柬禾、雨禾爭起來了，雨禾一下子就哇哇大哭，說哥哥欺負她，我也隨之呵斥了幾句，這一來附近帶孩子遊樂的老美們仿佛嗅到了什麼一樣都齊刷刷探視過來，他們是聞不得兒童大聲哭的，吓得我趕緊把雨禾抱起來哄，不給人以“大人打小孩”的印象，因為我聽人說過，老美最愛管有關小孩的閑事，只要發現有“大人打小孩”，立馬會有人打“911”，然後警車與警察就會像從天上掉下來一樣突然出現在你面前。

美國的城市與郊區遍布兒童遊戲場，馬路上只要走一段就可見一簇簇的滑梯與秋千，加上一塊一塊的大草坪與草坪上起起落落的烏鴉。一到黃昏，全城的滑梯上、秋千上都是孩童的笑聲，印度老人還會把他童話般的小屋叮叮當當地踩來，將一支支甜蜜的冰淇淋送入孩子的歡呼。一個美籍華人告訴我，美國是孩子的天堂這話是不假的。

有一件小事也曾吓我一跳。那天晚飯後我照例帶柬禾、雨禾去門外的兒童遊戲場玩，也照例玩那個自己發明的“抓海盜”追逐遊戲，我們在各類滑梯上竄上竄下，用手勢比划着槍互相射擊，然後互相裝着中彈倒地的樣子，然後又奔跑。這時候一個皮膚白白眼睛圓圓的美國小男孩自動參加進來，他頂多四五歲的樣子，也在我跟前躲來躲去，滑梯里竄進竄出，而且他裝着中彈的樣子比柬禾、雨禾都專業，每次都作連續中彈的模樣，身子後傾，一連串的抖顫，極為逼真，估計都是電視教育的結果。那位管他的母親，就在附近晃蕩，任孩子吼叫着奔跑着。而使我驚駭的是，在奔跑了幾大圈之後，我忽然發現這個四五歲的孩子竟然是打着石膏的，一只粗粗的雪白的手臂彎在胸前，我起先還以為他彎着手是裝握槍的姿勢，誰知是個傷員。我趕緊停止了“抓海盜”，帶着柬禾、雨禾走了，與一臉委屈與惋惜的美國小男孩互道拜拜。我後來想，她母親也真捨得啊，敢讓這麼個年歲的小傷員玩得那麼激烈，要是在滑梯上或者在泥地上再撲面一跤，二次骨折怎麼辦？如果是換作一個骨折的中國五歲孩子，還不乖乖坐在家中養傷，還少不了大人每天的數落、總結、教訓、吓唬，這美國大人怎麼就管不住美國孩子呢，還敢微笑着目送石膏孩子瘋跑呢？

我很相信美國家庭只管孩子到十八歲的社会習俗，自小就尊重到如此程度了，還何談十八歲以後的教育，那時候的教育就全歸了社會了，社會塑造孩子什麼，孩子就是什麼。孩子不是你家的了，是社會的了，孩子也不必像你，而是像社會了，社會需要他是什麼角色，他就是什麼角色了。再說，那時候，孩子也根本不在你身邊了，早就天南海北了，你喊都喊不應了，而且美國沒有中國的春節、春晚、春運一說，沒有“常回家看看”的紐帶，你拿你的孩子怎麼辦呢？再如果你的孩子缺乏自制力，與不良社會絞在一起，那就是那個柬埔寨女人最為害怕的“壞孩子”前景了，所以她必得要把她的兒子帶回柬埔寨去“茁壯成長”，她認真地對我說：“我還要等七年。”我說：“應該是八年。”她堅定地說：“七年。”我於是估計他的兒子其實今年已經接近三歲了。

我沒有去過柬埔寨，但我知道那是個純潔的佛教國度，九成半的國民皈依了釋迦牟尼，近代雖有過一次腥風血雨的中國“文革”式的浩劫，但传统文化的底子仍是深厚的，我相信這位柬埔寨女人的兒子長大後，一定是個孝順的顧家的孩子，在雙親晚年的時候還能守在身邊倒水遞茶嘘寒問暖，絕不會“白養”，而且我還進一步相信，這位在十歲之時回到祖國的孩子，一直會感謝父母當年的決策，甚至還會以同樣認真的態度，決定自己孩子的撫養地。因為東方人有東方人的信仰，這種信仰不關乎宗教，關乎血液。

現在有一種分析信仰的角度，稱作：“歐美發達國家，最宏偉的建築主要是教堂，因為那里存放着他們的信仰——博愛、自由、平等；日本，最奢華的建築主要是學校，因為那里存放着他們的信仰——知識、技術、進取；中國，最宏偉的建築主要是政府大樓、銀行，因為那里存放着他們

的信仰——金钱、权力、傲慢。”这话有一定的振聋发聩之理，但也不囊括全面，有些事是文化深处的事，是血液里的事。

我曾经问过女儿，你这么积极地把一双儿女安排在美国过夏令营，你考虑过移民的事吗？因为我的亲家母就在北京的一家移民机构做事，还是个头，每天的活儿就是研究如何多快好省地把同胞送出国门占领世界，她的子女要出国那绝对不是难事。而我的女儿对我的回答是，不考虑，我们就做中国人。束禾、雨禾马上鹦鹉学舌说：“我们就做中国人！”这当然好，做中国人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又试探着问，北京水不好，空气里有沙子，还有PM2.5，实在不适合居住，考虑过到南方城市工作吗？女儿说宁可少活五年只要这辈子活得充实活得精彩就足够了。她这么回答我也就无话可说了，这是个人生观问题。我知道女儿目前忙得红火，只要她高兴那就行了。

实际上人在哪儿高兴哪儿就是天堂。

我客居美国西海岸已一月有余，天色明净，阳光清风，面朝大海，鲜花盛开，但我也知道，我的子孙后代肯定是要在北京的PM2.5里繁衍了，而且据专家说环境治理再快也起码要有四五十年时间，这还是乐观估计，那就让我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吧，我还有其他什么歌子可唱吗，再想想，孩子总归是成长在东方了，像谁是谁吧，可能也会有那个柬埔寨女人所讲的种种好处，那就知足了。

尽管美国那么清爽那么强健，世界老大。

算了，不去分析他也不去羡慕他了。

在改革的日子（上）

■ 周玉玲

1985年6月。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市财税局，受命担任杭州市委常委、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事先没有人给我“吹过风”，也没有人给我“打过招呼”，确实感到有些突然。我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更没有丝毫上任前的兴奋，只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压力。看来，我这个“当苦力”的，今后的担子更重、更难挑了。

一位已退休的副局长听到我要调动的消息，特地赶到我的办公室，再三劝我：“纪检这活不好干，还是留在财税吧！”我心里清楚，现在财税业务逐步熟悉，内部机构基本理顺，与班子同志也相处得很好，工作起来自然顺心顺手。但是我又想到，是党组织把我这个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学生培养成领导干部，就理所应当为党的事业挑起重担、当好“苦力”，我怎能有理由去挑肥拣瘦？！这，虽然只是朴素的感情，但我认为，这种朴素的感情，也是为党奋斗的原动力。现在，既然纪检工作这副担子需要我去挑，哪怕是压力最大、工作最苦最难最累，也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闯。

然而，这副担子挑起来确实有点重、有点难。七年间，经历过纪检工作不被人理解的苦恼，也经历过在工作探索过程中不知如何干好的困惑，但更多经历的是大家在一起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的友情，是突破一件件重大案情、纠正一股股不正之风后的喜悦，是挽救一个个犯错误干部、挽回一笔笔经济损失之后的欣慰，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纪检工作起到保驾护航、促进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振奋。

反腐之剑

到纪委工作初期，正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经济要上去，纪律要松绑”，有的甚至说“纪检部门是改革的绊脚石”。一些纪检干部感到有压力，工作上缩手缩脚。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对我这个刚上任不久的纪委书记来说，也感到有点难。

怎么办？思来想去，我觉得，只有从学习中去找答案。学习上级纪委的有关文件，吃透精神；向纪委老同志学习，一起交流商讨；到县（市）区纪委调查研究，共同探讨新路子。接着，召开市纪委会常委会议，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市纪检工作理论研讨会，并邀请搞经

济研究和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同志参与讨论。在研讨中，大家达成了共识：纪检干部必须要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尽心竭力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肩负纪检重任，牢记反腐使命，任何条件下纪律绝不能“松绑”，任何时候反腐之剑绝不能放松。

有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1987年9月，群众举报扬伦造纸厂原党委主要领导等贪污、受贿问题，我们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到扬伦造纸厂，在调查中发现这一伙人打着改革的旗号，钻改革的空子，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受贿、索贿，严重挫伤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企业的效益急剧下降，一个好端端的盈利企业变成了亏损大户。我们严肃惩处了这些“蛀虫”（涉案19人，其中厂级干部5人），协助调整了厂领导班子，加强了管理，堵塞了漏洞，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生产迅速上升，当年就扭亏为盈，第二年就实现利润358万元。这个事实说明，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对反腐败工作也一样，越是改革开放，越是搞经济建设，越需要经常“打扫打扫”。扫清了“灰尘、垃圾”，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才会充满活力、生机勃勃。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违纪违法问题也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大概是在1988年，我们协调查处了市二轻总公司下属长征轧钢厂发生的百万元巨款诈骗案。这是一起案中有案的连环案，作案人员有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和职工群众；有金融系统的办事处领导和信贷员，也有个体经营户。他们内外勾结、上下串通、政企结合、左右织网、互相利用，结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共同体，涉及13个单位42人，从中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物等各种违纪违法金额高达600多万元。在这42人中有党员12人、科级干部6人。尽管牵涉面广，作案手法多变，案情复杂，难度很大，但我们毫不犹豫地盯住不放，组织人马协同作战，一层层挖掘，一个个击破，终于把这个连环案查个水落石出，将这些“金钱和权力的共同体”成员绳之以党纪国法。

由此可见，反腐之剑务必时刻高悬，必须以铁的手腕、高压态势，毫不留情地严惩腐败者。只有利剑出鞘，严惩腐败者，才能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营造出一片蓝天净土。从1984年到1988年，在各级纪委的共同努力下，全市共查处违纪党员3038人。其中开除党籍569人，留党察看751人，撤销党内职务131人。受处分的党员中，有县级干部15人，科（处）级干部148人。清除了蛀虫，打扫了垃圾，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维护了党纪的严肃性，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保护之责

党的十三大后，中纪委对纪检工作提出“保护、惩处、监督、教育”四项职能。我认为，这“四项”职能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尤其是把“保护”作为四项职能之首，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着特殊意义。因为，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改革者在改革工作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失误，只要不是违法乱纪，就应该尽力保护、支持改革者。

履行“保护”之责，对于纪检部门来说，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怎么“保护”？没有“条文”可照办，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去试一试、闯一闯。我们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支持改革者，帮助失误者，惩处违纪者”的工作方针，并制定出支持、保护改革者的10条实施原则。如对改革中触犯了少数人利益而遭非议、责难和反对，甚至恶意中伤的，要予以主持公道；对改革中因缺乏经验而造成工作失误和偏差的，要热情帮助；对改革成绩突出，缺点、错误也比较多的，只要不是中饱私囊、违法乱纪的，要引导改正；既要查处钻改革空子而违法乱纪的人和事，又要查处诬陷、打击改革者的人和事，尽力为改革者“清障”、“减负”。对这10条原则，不仅要求各级纪委切实贯彻到履行各项职能之中，而且通过杭州日报公布于众，理直气壮地为改革者撑腰，受到了广大企事业单位的广泛好评。

接着，抓正反典型引路。我们先后总结了杭州中药二厂厂长冯根生、杭州木材总厂副厂长来奎吉等一批党风正、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实绩显著的企业家的先进事迹，在全市树立起一面面改革者的旗帜。同时，剖析了原扬伦造纸厂这一伙“蛀虫”等一批打着改革旗号、钻改革空子、进行违法乱纪，破坏和阻碍改革的案例。通过新闻媒体，大张旗鼓地进行舆论宣传。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正反典型的教育中明辨是非，学有榜样，戒有所鉴。

也就在这个时候，市机械局下属一家工厂在改革中，有位党员不断地来信“揭发”该厂党委书记等厂领导违法乱纪行为。对此，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协同该局纪委进行调查。在调查中发现，这位党员是因为对自己“文革”中犯错误受处分不满，就肆意捏造事实，到处诬告。经查清事实真相后，一方面通过公开场合为该厂党委书记等人正名；另一方面给这位党员以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作为典型事例在杭州日报上公开通报，以消除影响。通过多种形式，着力营造“扶正祛邪”、支持和保护改革者的氛围，为改革者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我深知，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政治禁区依然比比皆是，在履行“保护”职能过程中，一旦摸不准“石头”，是要担政治风险的。比如，1986年，市二轻系统下属企业钢材原料紧张，经常为“断炊”发愁。市二轻工业供销公司想办法与铁路材料厂串换，经销了4千吨废路轨。当时，钢材包括废钢铁都必须按政府计划供销的。有关部门发现后，要作为倒卖钢材的重大投机倒把案件处理。问题反映到了我这里。按以往的做法，这类案件很有可能会同意移交司法机关。但这个时候，我还是比较冷静的，不马上签批，先深入到市二轻下属有关企业调查研究。在听取汇报和召开座谈会后，觉得这是“双轨制”情况下出现的问题，要处理好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不能因循守旧，不能把新问题往老框框里套，而应该用改革的观念去思考、去分析。但我心里又清楚：当时还没有“红头文件”，搞得不好，个人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可再一想，改革没有现成的路，认准了就应该去“闯一闯”。

于是，我们立即召开有公安、检察、法院、工商、审计等执法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企业“找米下锅”的实际情况，并就此案反复进行讨论，终于用改革的思路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处理。市二轻的同志对此十分感激，说：“要不是纪检部门的努力，我们肯定要受牢狱之苦了！”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新旧经济体制的转换，常常呈现出矛盾交织、利弊伴生的局面。对于这些矛盾交织、利弊伴生的新问题，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也摆到了纪检机关的面前。比如，杭生电扇厂在企业改革中，有人到处写信“告状”，搞得厂长晕头转向。我们接到“告状”信后，立即组织人员到企业了解，经过调查，分清了是非。原来是改革触动了少数人的利益，个别人不甘心既得利益的失去，就抓住改革中的一些细枝末节到处“告状”。为此，我们不单是批评个别人到处乱“告状”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教育入手，引导这些人学习改革理念，正确处理改革大局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积极投身改革的大潮中：同时公开为改革者撑腰，鼓励他们大胆探索，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改革深入。仅1992年，全市纪检机关就澄清不实举报569件，保护党员干部566名，从而调动了一大批勇于改革、开拓创新的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作者系六届市政协副主席）

曾经挥洒巨金 后来追讨小钱

《申报》笔下的胡雪岩

■ 张学勤

晚清胡雪岩的往事，如今几乎都是通过小说、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在流传，这也就多少带有了戏说的成分。其实，在晚清的《申报》中，却有不少有关胡雪岩的新闻，这些即时的新闻报道有助于我们贴近一个更真实的胡雪岩。

左门剃左眉

右门剃右眉

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冬天，杭城的天气特别寒冷，寒暑表测得的当时气温是：华氏28度（32度即结冰了）。农历十一月十一、十二日两天，连降大雪，杭城道路上的积雪厚达寸余。整个城市成了水晶世界。

暴风雪中，不少乞丐、穷民冻死在街头，当时的《申报》报道说：大雪后至十一月十七日，杭城

冻僵道毙者，共有40余人。

十一月十八、十九、二十等日，杭城街头，但见众多乞丐、穷民扶老携幼向同一个方向奔去。有路人询问说：“你们去哪里啊？”他们的回答是：“望仙桥元宝弄胡雪岩家，去领取棉衣。”于是，也有路人随同乞丐、穷民去看热闹。

到了元宝弄胡宅大门口，但见“群丐拥挤，几如堵墙”。大门内，站着一个老头，他指令乞丐、穷民一个个进来。到了门楼下，一个手拿剃刀的理发师，便上前为每个进门的人剃去左眉半条。随后，被剃去左眉的人便被引入左仪门。左仪门内，设有高台一座，有人在此负责发放棉衣。他们先验看被剃的左眉，然后，发给新布棉衣一件、新布棉肚兜一个，并发小票一张，上面写明：“至除夕日，来领取大米一斗、钱两百文”。

领到棉衣、肚兜、小票后，乞丐、穷民被引导从右仪门出去，右侧也站有一个手执剃刀的理发师，看到有人拿着棉衣、肚兜出来，就上前为他们剃去半条右眉，然后放出。

《申报》在报道此事时，作了这样的评价：胡绅乐善好施，于冰雪载途之际，“既被之以重棉，更饱之以年米。其用意也，周；而立法也，密。”（参见1874年1月17日《申报》）

重建伏虎庙

赠送雷公散

清代，杭州抚凝巷内，有一座伏虎庙，祭祀的是宋代忠臣李若水。咸丰年间，太平军两次攻入杭州，抚凝巷一带成为焦土，伏虎庙也就荡然无存。清军收复杭城后，胡雪岩独自出资重建伏虎庙，不仅建造了宏敞的殿宇，还添建了厨房、浴室等生活用房。此外，胡雪岩还在庙的右侧，再建精室数间，用作办事场所。新庙落成后，胡雪岩还借此庙为胡庆余堂免费发放药物的场地。

光绪七年（1881）夏天，杭城民间流行一种似痧非痧的疾病，“初起，微觉腹痛。旋即昏然倒地，口不能言而死。或有饱饭黄昏，而晓卧不起者；或有同席欢饮，而隔宿已亡者；或有抵家数步，而已不及者；或有延医未至，而人已先逝者。医生均束手无策。”此时，胡庆余堂已获得一张“雷公散”的药方，对付此种流行性疾病颇有疗效。考虑到疾病发作很快，用药必须及时，胡雪岩便组织人员按照药方配齐各味中药，在伏虎庙中免费赠送。远近市民闻讯后纷纷赶来，一时间，庙门如市，热闹非凡。

胡雪岩终年在伏虎庙施放药物，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善名，也提升了胡庆余堂的知名度、美誉度。更多的人知道了胡庆余堂的药材地道、药方灵验。胡庆余堂的生意也就更加兴旺了。这也引起了业内某些人的眼红，于是，便有人开始打歪主意了。

据《申报》报道，当时，有甲乙两个杭州人，以低价购进劣质药材，自制各种丸散膏丹，并私刻胡庆余堂的图章、招牌等。然后，雇船前往嘉兴、湖州等地贱价叫卖这些药物。当地乡民一看是胡庆余堂的产品，价格又如此低廉，于是不管是有病之家还是无病之家，都争着购买。

但是，也有乡民对胡庆余堂的药卖得如此低廉提出了质疑。甲乙两人的回答则是：“我们有亲戚在胡庆余堂做伙计的头头，我们的丸散膏丹都是从胡庆余堂的内栈批发而来的，所以价格很低。”

购买者听了此话也都相信了。甲乙两人的货物因此脱手很快。

然而，时间长了，纸毕竟是包不住火的。甲乙两人的行径被当地药界同行识破后，有人就向胡雪岩作了通报。胡当即密令家人前往调查。查证确实后，胡家的人便将甲乙两人和低劣药物一并押解到杭城，送入钱塘县府。汤姓县令审讯后，下令给甲乙两人带上巨枷，发往胡庆余堂示众。

示众当天，甲乙两人被押在门外石栏上。一时间观者塞途。甲乙两人羞愧难当。次日，两人被移入门内，让他们坐在门凳上。围观的人们看到：甲以手巾包住口鼻，只露出眉额；乙则用袖子蒙头，向壁而卧。毕竟这两人都是杭州人，怕有更多的熟人看见。

其实，这两人都只有20岁光景，“人亦文秀，衣衫整洁”，并有羞耻之心。所以，胡庆余堂内也出现了为他们求情的呼声。最后，还是店主人胡雪岩发话了：“如能悔改，日后当于店中位置一席。”

对此，《申报》记者评论说：“是则店主人真能威、爱并用也已！”（参见1881年9月29

日《申报》)

修复灵隐寺

为母祝大寿

清代的灵隐寺早已是杭州西湖的第一大丛林，“殿宇宏敞，亭阁台榭计二十余处，僧人共有五六百名”。太平军攻入杭州后，灵隐寺遭到严重损毁，“所有房屋仅存百中之一”。清军收复杭州后，西湖上的各寺庙都在渐次恢复，唯有灵隐寺难以恢复，因为工程特别浩大，“非得数万金，不能济事，如欲恢复旧日规模，为数尤鉅”。

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胡雪岩走进了灵隐寺。该寺住持诚敬地接待了这位财神，并再三恳求其带头捐款修寺。胡雪岩慷慨答应，决定“先造山门，并修复罗汉堂、韬光亭、冷泉亭、月桂亭、飞来峰等名胜共七八处”。

胡雪岩说话算数，动作迅速，1个月后，土石、木料均已备齐，随即就开工修建。对于胡雪岩的这一举动，报道此事的《申报》的记者却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修复名胜古迹和救助灾民，的确都是善举、美举，但是应该有轻重缓急之分。当前，灾荒严重，灾民饥谨，应该将救助灾民列为首要。

当然，这位记者并不知道胡雪岩心中的另一个盘算。

到了光绪八年(1882)六月，所有修复工程已全部竣工。破败的灵隐寺开始有了新面貌。

当年的七月初二，是胡雪岩母亲80岁生日。胡雪岩决定在灵隐寺大建水陆道场，为母亲祝寿。从六月廿五至七月初五，这11天中，灵隐寺景区居然成了一座锦绣之城。山门内的两侧，长长地排列着几十座新搭的棚子。棚子外面全用锦绣作帷帐，绸缎作装饰，棚子四壁挂各方送来的屏联、寿轴，地面则铺地毯。

获悉胡雪岩的母亲八十大寿，各地的屏联、寿轴如雪片般地飞来。棚子里张挂屏联、寿轴就成了技术活，必须层层相接，“密若鱼鳞，排同大雁”。

据《申报》记载，这些成百上千的屏联、寿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官场，上至李鸿章、左宗棠，以及督抚提镇，下至司道府县、各局员董，无不毕备；一方面是商界，各省洋行、银号、行栈、庄店，巨贾豪商、盐号典库，应有尽有。送来的寿礼更是“夸多斗靡”。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李鸿章、左宗棠所送的寿联。李的寿联上书“慈竹长春，恩晋鸾章；一品晚萱，益寿荣周。凤纪八旬。”左的寿联为“寿永八旬，舞看莱子；筵开七月，酒进麻姑。”其余寿联，《申报》均不作记载。(参见1882年8月26日《申报》)

当年散万金

如今追小钱

《申报》有关胡雪岩捐巨款做善事的报道较多，胡雪岩是动辄就捐万元。

光绪七年，杭州瓶窑发生客民械斗事件。寄居在当地的温州、台州籍客民和湖北、湖南籍客民发生大规模冲突，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械斗中，由于两湖籍客民人少，处于下风，便集体逃至省城杭州告状。省城高官对此并无良策，而如此多的客民集聚杭城也是一大隐患。最后，还是胡大善人插手解决了此事，胡雪岩的方案是：每人给16两白银，由官员押送回原籍。这笔大资金全部由胡雪岩承担。

同年，陈宝渠在上海创办栖流公所，动员各界捐款。《申报》曾公布35位捐款人名单和捐款数目，其中，胡雪岩捐了1万元；其余34人中，最高捐50元，最低捐1元。

到了光绪九年(1883)的冬天，胡雪岩设在各地的钱庄纷纷倒闭。胡雪岩财大气粗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当年十二月廿一日午后，胡雪岩从金陵乘坐“源源”号小火轮抵达上海，轮船泊于铁路大桥旁。胡雪岩上岸后，没有带行李、箱笼。他嘱咐船上的修容匠张行禄在船上照看行李。不料，到了傍晚6点半，船上传出贼讯，一检查，发现胡雪岩的箱笼已经被人打开，失去现洋700元。于是，马上报告巡捕房。巡捕房派包探康阿顺前来调查，获悉一个叫张阿五的驳船户曾来此客串过。于是，迅速搜查张阿五的驳船，查出现洋200元。然后让胡雪岩辨认。胡雪岩辨别后说：这不是

我的钱。

张阿五的嫌疑被排除后，“源源”号小火轮上的1名船老大、1名舵工、两名水手、及修容匠张行禄等5人都被带到了巡捕房。胡雪岩则写了一张条子给巡捕房的黄太守，说：“此案决非外贼行窃”，“请分别讯究”等语。可见，胡雪岩是一心要追回这700元大洋。

但是，巡捕房对这5人审讯后，也没有发现什么疑点。最后，决定由此5人承担赔偿责任。这5个被押之人便托人与胡雪岩商量，能否少赔一点。讨价还价后，胡雪岩同意赔350元。来人继续求情，最终，胡雪岩同意再减50元，赔300元。（参见1884年1月20日《申报》）

当年挥洒万金，如今追讨小钱。《申报》的这一则史料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破产后的胡雪岩经济拮据的信息。

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初九日，《申报》刊出胡雪岩的死讯和按语：

昨有友人自武林来，言前办西征后路粮台、江西候补道胡雪岩观察，于本月初一日子时弃世。初三大殓。闻之不胜惋惜。按：胡君白手起家，以布衣而名达九阍，誉隆四海。左文襄极为倚畀，虽时运不齐，晚年泰极而否，然其平日施药，施衣，行善不倦，钱江义渡嘉惠行人。至今，往来者莫不颂其德。

另据《申报》报道，破产后的胡雪岩“晚年奉母家居，深居简出，颇有韩蕲王口不谈兵之概”。但是，杭州市民并没有忘记他。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倒闭后，有人在杭州城隍山上的药皇庙内挂出一副长联：

上联：廷臣称其名，乡老慕其名，中原外域震其名，讶！此中金穴难窥，取不竭，用不穷，统人悦之好色艳福，极欲穷奢，不知他修到几生，享尽豪华兼艳福；

下联：官项去其一，存款去其一，洋利折阅去其一，惊！此日铜山忽倒，悖而入，悖而出，合各省之典号栈庄，东崩西应，只赢得庆余两字，始知积善可传家。

当时，胡雪岩还在人世，应该能看到这幅对联。

西湖的历史星空之五十七■ 孙 跃

画竹能手萧悦

唐朝时，杭州来过一位著名的画家，他曾与白居易有过交往，名叫萧悦。

萧悦，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人，也有人认为他是杭州人，是唐朝中期的著名画家。对萧悦的生平，史书中没有详细的记载，有关他的一些事情，主要来自白居易的一些诗文。

萧悦曾在朝廷中做官，担任负责祭祀和节庆仪式时演奏乐曲的协律郎职务，这是太常寺中的一个小官，正八品上，因此也有人以官名称呼他“萧协律”，类似我们现在官场中“李局”、“刘处”、“赵科”等称呼。唐长庆年间（821年-824年），萧悦在杭州与白居易相识。

萧悦与白居易较熟，经常参与白居易的一些游览活动。他曾与白居易等人一起游览杭州恩德寺，白居易写有游恩德寺的诗，他在诗序中说：“予以长庆二年冬十月到杭州，明年秋九月，始与范阳卢贾、汝南周元范、兰陵萧悦、清河崔求、东莱刘方舆同游恩德寺之泉洞竹石。”白居易离开杭州以后，有诗寄给萧悦，如《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诗中有“歌伴酒徒零落尽，唯残头白老萧郎。”萧悦的官职低，作为低层的官员，生活还是比较贫困的，对此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时写的《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有所反映：“余杭邑客多羈贫，期间甚者萧与殷。天寒身上犹衣葛，日高甌中未拂尘。”从这首诗中还可以看出，白居易曾送衣服给萧悦。萧悦工于书画，尤其擅长画竹，萧悦画的墨竹在当时画家中首屈一指，无与伦比，世人都喜欢他画的竹。萧悦也很珍视自己的作品，画作不轻易赠人，有人几次向他求画，他都没有答应。唐代书画家、书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萧悦画的竹十分推崇，说他“工竹一色，有

雅趣。”唐代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记载：“萧悦，工画竹，有雅趣。说者谓墨竹肇自明皇，萧悦得其传，举世无伦。”北宋宣和（1119～1125）年间由官方主持编撰的宫廷所藏绘画作品的著录著作《宣和画谱》中，对萧悦也有记载，说他“唯喜画竹，深得竹之生意，名擅当世。”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说：“萧悦之工竹，李约之善梅，深有雅趣，无与伦比。”萧悦的绘画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宣和画谱》中著录了萧悦的2幅《乌节照碧图》和《梅竹鸛鹑图》、《风竹图》、《笋竹图》等5幅作品。

白居易特别喜欢竹，写过《新栽竹》、《东楼竹》、《玩松竹二首》、《竹楼宿》、《洗竹》等。有一次，萧悦画有十五竹图送给白居易，白居易见到以后很高兴，以一首《画竹歌》诗答谢萧悦：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

萧郎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

人画竹身肥臃肿，萧画茎瘦节节竦。

人画竹梢死羸垂，萧画枝活叶叶动。

不根而生从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

野塘水边碣岸侧，森森两丛十五茎。

蝉娟不失筠粉态，萧飒尽得风烟情。

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

西丛七茎劲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见。

东丛八茎疏且寒，忆曾湘妃庙里雨中看。

幽姿远思少人别，与君相顾空长叹。

萧郎萧郎老可惜，手颤眼昏头雪色。

自言便是绝笔时，从今此竹尤难得。

白居易在《画竹歌》序中说：“协律郎萧悦画墨竹，举时无伦。萧亦甚自秘重，有终岁求其一竿一枝而不得者。知争天与好事，忽写十五竿，惠然见投。予厚其艺，高其艺，无以答贶，作歌以报之，凡一百八十六字云。”

白居易说萧悦画竹“不根而生从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是说萧悦在画竹前已胸有成竹，对竹这一审美对象已有自己的理解、构思和想象。有了“意生”，经过创作实践，达到了“笔成”的效果。

萧悦画这幅十五竹图时，已是“手颤眼昏头雪色”的晚年，他自己说这是他的绝笔，因此白居易感到了这幅画的珍贵。可惜的是萧悦的这幅竹子图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通过白居易的诗，还是可以领略到它的风采。从白居易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萧悦给他画的竹子的样子：竹枝清瘦，茎节劲健，疏寒萧飒，叶叶生动。我们还可以在白居易《萧悦画竹论》中的“举头忽看不似画，侧耳静听疑有声”感受到萧悦所画竹子的生动风采，体会到白居易为什么要说他是“丹青以来唯一人”了。